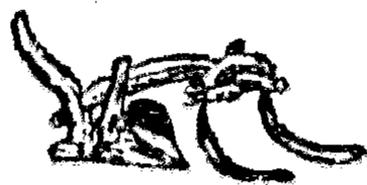


經濟論衡

許滌新著

經 濟 論 衡

許 滌 新 著



耕 耘 出 版 社

目錄

代序 刷淨俗流學派的灰塵

- 一：怎麼學起經濟學來？——二：刷淨俗流學派的灰塵——三：對於學習經濟學的態度

第一 「社會價值」還是勞動價值？

- 一：又來了一位杜林先生——二：關於價值——三：利潤資本主義生產——四：地租·地價——五：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勞動時間——六：「狂妄而不負責任」

第二 關於購買力平價說

- 一：購買力平價說的要點——二：使用這一學說的場合——三：貨幣數量說的錯誤——四：關於「兩國貨幣對內購買力之比」——五：被紙幣現象所迷住的俗流見解

550.186
612-7
2

第三 所謂人性論

- 一：用人性代替欲望——二：經濟思想中的人性論——三：爲什麼拾出人性論來呢？——四：人性論在中國

四一

2

第四 全體主義是什麼東西？

- 一：全體主義代表了誰？——二：全體主義的思想淵源——三：史班的方法論——四：什麼是史班的社會？——五：經濟是「全體」裏的肢體嗎？——六：「達到目的之手段的結構」(?)——七：所謂「機能」和「優能」的概念——八：價值·價格·市場——九：全體主義是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敵人

五六

後記

八九

刷淨俗流學派的灰塵（代序）

一 怎麼學起經濟學來？

當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並沒有做着一次學習經濟學的夢。那個時候，中國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的出版物，正像雨後的春筍一般，在出版着。我的學校，雖然僻處在一個冷靜的城市，但是新式的切書邊的書，被一個具有服務精神的「青年書店」，帶到學校的門口擺列起來了。我也就在這種氣氛之下，讀了中國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一些創作。沒有幾個月，中學快畢業了。每當息燈未睡之時，總欲想一想：「將來學什麼呢？」那時的答案，是希望學文學創作。

進入C城的C大學以後，一心一意是打算學習西洋文學的。那是十八年前的事了。中國正在過着奔騰澎湃的日子。人民大眾在怒吼。青年們也在怒吼。爲了改善生活，工人們要求增加工資。那時就有人說，工資是物價的成本，工資提高了，物價不是要上漲嗎？物價漲了，曾經提高了的工資不是「此漲彼消」，實際上，還不是同沒有提高一樣嗎？這個問題，很使當時一些工會工作者爲難。因爲大家都不深切了解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而勞動力有兩重性的緣故。我亦爲答覆這個問題而苦惱着。是時坊間出現的一些小冊子，如李漢俊譯的「資本論入門」（日本人著的），李季譯的「價值價格與利



潤」，雖然隨手買到，但總是讀不下去。還有一件事也使我感到困難的，這就是東方雜誌上常常登過一些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經濟的論文，什麼通貨膨脹，什麼馬克下跌法郎上漲，讀起來總是頭昏腦脹，莫明其妙。這兩個問題老是縈繞在我的腦際，老是刺激我，驅迫我去弄個明白。但是，我並沒有在這個時候，決然捨去懷古的情趣和審美的興緻。學習創作的念頭，仍然在我的意志中佔着統治的地位。

沒有多久，氣候突然起了變化，我被迫離開學校，回到偏僻的故鄉去了。在那兒，暗地裏寫了幾篇小說和小詩。那是以當時的見聞為題材的，但是，自己讀起來，覺得太單調了，太不成樣子了，於是便轉而想學習文藝批評。那時出版不久的文學大綱，便是我的主要讀物。這一部龐大而有點蕪雜的巨著，使我越讀越不知如何是好。好在創造社出版的「流沙」與「社會批判」，時常登載一些用唯物史觀解釋文藝的文章。讀到這些文章，使我高興極了！這是把握文學思潮的線索，這是分析文學作品的利器，於是，我便重溫以前讀不懂的唯物史觀公式了。那個時候，馬克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尚未譯出，英文本在內地又買不到，感謝胡漢民先生的「唯物史觀的批判」中載有馬克斯關於唯物史觀的斷片。

唯物史觀對於社會與文藝之解釋，使我越讀越發生興趣，於是我便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借得一些解釋唯物史觀的書，但這類書，當時在中國翻譯得較多的是考茨基與河上肇的著作。我便從這些帶

有毒素的著作中，去學習唯物史觀。經濟是社會的下層建築，是社會的基礎。越學習，越引起我對於政治經濟學的興趣；過去那些不能回答的問題，又常常要求我去求得解答，再加上自身的實際生活的刺激，於是，我便捨棄對於文藝的鑑賞，一百八十度地轉過來，決心學習這一門冷酷而充滿着戰鬥性的政治經濟學了。

二 刷淨俗流學派的灰塵

在一個僻處海角的A大學裏，我進了經濟系。教我們經濟原理的有二位教授，一位是英國牛津大學的經濟學碩士，一位是德國柏林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前者是崇拜馬先爾的，後者則崇拜松巴特。但與我們關係更多的是前一位。他認為馬先爾的經濟原理太高深。故改授季特的書。季特的社會聯帶主義，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但其價值論則完全成爲奧國學派的俘虜。我讀了它，不但不能使我回答上面所述那個工資問題，反而使我更糊塗了。難道世事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麼？難道蘋果樹上生着蘋果而資本的果實就是利息麼？（他們是把利潤和利息混爲一談的）難道工人的工資是決定於其勞動的邊際效用麼？難道資本只是作爲迂迴之用的生產手段麼？這些問題又一個一個的襲擊着我。我去問這位教授，他笑着說，「問題的答案就如書上所說的」。

這樣的書，的確確沒有解決我所爲難的問題。沒有多久，我到S埠去了。在L大學裏，教我們

學習經濟的是S先生，他是一位自由主義者。雖然在內心上他是一位信仰邊際效用說的人，但同學的質疑，使他不得不在講價值論的時候，把李嘉圖、馬克斯與奧國學派的見解，分別介紹給我們。這種比較的方法，對我們的學習，收效是很大的。就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消耗了極大部份的時間在圖書館中讀古典派的幾本著作，讀英譯的資本論，間亦涉獵及奧國學派、新古典學派與制度學派的東西。

這是一個沉悶的時期，我的沉悶的腦子亦盤旋着各種經濟思想，但經過了一番比較之後，我便漸漸地看出俗流派的經濟學說，都是建築在沙灘上沒有鞏固基礎的房子。他們把那些脫離生產過着荒淫逸樂的生活的人們的消耗的寄生觀念，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他們把幻想中的沙漠旅行者對於飲水的渴望作為決定價值的張本；他們把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混為一談，他們不把商品作為研究的對象而把財富作為研究的對象，照他們的說法，在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前就有資本的存在，照他們的說法工資是決定於勞動之一邊際效用的，勞動力的購買者並沒有從勞動者身上取得比工資更多的價值。然而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並沒有什麼資本，用勞動的一邊際效用去解釋工資，是無法解釋利潤的本源的。誠如馬克斯所說：「他們所成爲問題的，不是真理與非真理的問題，祇是與資本有益仰有害，便利仰不便利，違背警章仰不違背警章的問題。超利害的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領津貼的論難攻擊；真正的科學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辯護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惡的意圖」。在學理的研究中，在每一個問題的比較中，使我一步一步的認識俗流派的真相。

不僅學理本身的研究比較，使我一步一步的弄明白，更重要的還是客觀事實的發展與印證，使我更加堅強這種認識。第一件事是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二件事是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恐慌與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成功。

中國社會史論戰暴露了托洛茨基派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之破產。他們不從生產關係去把握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而從輪船航船等交通工具的比較上得出謬誤的皮相的結論；新思潮派是看清中國社會的封建性的，但他們却忽略了中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特質。只有全面地從動的邏輯去把握，才能認識中國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社會。這種看法，是那些見木而不見林的人或玩着生意經的經濟學家所不能夢想的。他們把經濟範疇看成孤立的物，隱藏在物的外衣之下的人與人的關係，都被看落了，因此，依據這些教條，是看不見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關係，亦看不見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剝削關係的。制度學派的主將康孟斯的一位高足（這位先生後來做了漢奸），回到中國來沒有幾天，便大發其中國可能發展成爲美國的妙論；過了不久，他看見官場的一些不可見人的事情之後，便潸然的說：「照現狀，中國是不能發展產業的了。」這就是一個例子。這個例子證明：俗流學派的經濟學是不能解決中國經濟的實際問題的。只有新興的政治經濟學，才能使我們正確地認識現實，並且獲得改造現實的辦法。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恐慌，使我更明白地認識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的矛盾。一切從觀念論去解釋恐

慌的說法，都在無情的事實之前失色了。只有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學，越來越爲客觀事態之發展所證明，特別是戰後（指第一次大戰）資本主義相對穩定期的趨勢之預見，更是證明馬列主義的偉大力量。而對着世界恐慌的日益惡化，社會主義的蘇聯却在向上的走着榮繁的道路。一九二九年蘇聯的生產恢復了大戰前夜一九一三年帝俄的水準，此時資本主義世界亦完全復原並且一度超過戰前水準，可是，到了這個時候，資本主義與蘇聯經濟之間，便開始一個劇烈的分歧了。當資本主義經濟日益頹下，於一九三三年把它的生產降低百分之四十的時候，蘇聯的經濟便以歷史上無比的速度開始上昇。

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之所以能如此之雄飛突進，就是它取消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盾，而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正是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學說所揭發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恐慌與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之成功，都是在事實上證明馬克斯經濟學說的正確。

客觀的事實，解決了理論上尙不能一刀兩斷問題的。新古典學派，心理學派及制度學派一些尙殘留在腦子中的觀念，完全被無情的事實所驅逐了。到這裏，我才敢說自己是一名學習馬克斯主義的學生。

三 對於學習經濟學的態度

雖然自己確定了研究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與點觀，但對於資本論的理解還只是一些皮毛。有一個時

期，爲了生活的鞭笞，常常在東方雜誌與新中華上投稿，那時寫的文章，很少能從學理上消化材料。縱然那時我是在一羣同患難共死生的帥友的指導下學習，縱然那時我對於世事的趨向有更明確的認識與了解，但，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去理解經濟學理，去分析經濟問題的能力，還是差得很遠的。忙碌的日子飛也似的渡過着，我無暇去補救這一個缺陷。但，使我有暇補救這一個缺陷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民國二十四年春，我被人移居在一個連散步和說話都不許可的地方。尖銳而辛酸的生活，迫得人幾乎發瘋了。但這倒不使我怎樣難過，最不好受的是寂聊和空暇的襲擊。沒奈何，只好轉而埋頭讀書。在千難萬難之中，我獲得了日文本的何上肇經濟學大綱與拉奧二氏第八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程。我知道它們有毒素，就用深入細嚼的態度去研究它們，去批評它們，去與同住的朋友討論（當然是低聲暗語）。書，並不是好書，但是，那種方法，那種態度，的確使我在這方面推進一步了。抗戰的砲火，結束了這種索居的生活。我又在急劇的洪流中，研究一些索居時所讀不到的名著，分析一些在發展在變化的問題。然而，這仍然是淺游得很的。

爲了學習的進步，我抱着下列的態度：

第一，研究政治經濟學不應只讀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著作，而且還應研讀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因爲「馬克斯和恩格斯給了壟斷前的資本主義底基礎以分析，列寧和斯大林根據着資本論底基

理論點，往前發展了馬克斯底經濟學說，揭露了作爲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底規律性」（G·加克的「馬列主義是統一的整個的學說」）。跟着客觀事實的發展，馬克斯主義的經濟學同樣在發展着。毛澤東的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民族解放運動的新發展啊！

第二、研究政治經濟學絕不可只在經濟現象上做工夫，必須深入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內心去；欲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有相當的哲學修養。馬克斯的經濟學說之所以與布爾喬亞的不同，就是在於他從運動、變化、發生、發展和死亡的觀點，即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上去研究近代有產者社會的經濟。因此，離開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去研究經濟學，結果一定會陷入俗流學派的泥坑之中。

第三、研究政治經濟學單熟讀原理是不夠的。熟讀原理或死讀原理的結果，必定把原理當成教條。用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對待馬列主義的經濟學，那是絕對要不得的。因此，我們必須在經濟局勢的發展上去把握馬列主義。這就是說，必須從活生生的經濟問題的研究與分析上去學習馬列主義。譬如我們今天是處在抗戰已經七年的大後方，經濟的困難正在襲擊着我們。研究這種困難的根據，指出它的出路與趨向，乃是學習馬列主義經濟學者之所有事。如果閉着眼睛，不看現實，而醉心於書本上的原理，縱然把原理背爛熟了，但對於國家對於人民，却並沒有什麼用處。政治經濟學的教條主義，其禍害是不可輕視的。因此，研究政治經濟學必須是理論與實際底統一。

第四、要把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實際統一起來，必須認清我們今日所處的環境，必須弄清今天中

國是什麼社會。社會經濟的性質不同，則其經濟範疇的內容亦就不同。例如地租，在資本主義國家，這是超平均利潤的那一部份剩餘價值，而中國現行的地租則是前資本主義的方式，它不僅是超平均利潤的一部份，而且包括了平均利潤甚至相當於可變資本的一部份。以工資來說吧，中國現行的工資，一般還不能稱為勞動力的價格，因為工資制度中充滿了前資本主義的超經濟的剝削。以資本來說吧，外國資本、買辦資本、官僚資本與民族資本，亦是不能一樣看待的。外國資本在中國的投資，分明不是為中國打算。例如日本強盜在淪陷區中所設立的什麼國策會社，其目的完全在咀吸中國的人力與資源；買辦資本則在吸拾外資在華掠奪所得的一些殘羹剩飯，它們所幹的勾當，乃是為外國資本服務。官僚資本是高級的買辦資本，但同時又充滿着前資本主義的封建性，它是中國式的獨占資本。民族資本顯然與這三者不同，但它有着它自己的特點——如脆弱性、依賴性與投機性等等。對於這些問題如果不具體地以中國的實際情形為着眼點，那是很難不陷入教條主義的泥坑中的。

第五，研究政治經濟學必須緊緊地把經濟與政治聯系起來。一些俗流學派的經濟學者，是單純從生意經的眼光去研究經濟的。這樣的研究，只能在美金換法幣的算盤上跳舞，只能在抽象的統計數字上活動。這樣的研究，是不能了解事實的真相的。經濟是政治的基層，而政治則為經濟的集中；則是保護某一階層的經濟權益的條件。離開了政治，就沒法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政策的本質；離開了人民大眾，就沒法使經濟學理成為物質的力量。這就是立場的問題。

我所抱的這些態度，自己並不敢說完全是對，一定是對，所以提出來祇在供願意研究這一門的科學的朋友們之參考吧了。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

是「社會價值」還是勞動價值？

一 又來了一位杜林先生

距今六十六年前，柏林講師杜林先生，以「社會主義專門家及改良家的資格」，以吉訶德一般的勇氣與瘋狂，向科學的社會主義作「莫明其妙」的挑戰。不幸得很，這一位浮浪的騎士，在恩格斯的駁斥之下，他那種市儈社會主義的本質，便原形畢露地呈現在人們之前了；他那種五光十色的市民階級理論的斷片，便像深秋的落葉，狼藉地不可收拾了。不圖在六十六年後的中國，仍有人有聲有色地扮演杜林先生的角色，表演一齣引人發笑的悲喜劇。

這一齣悲喜劇之演出，是有它的來源的。這就是近來泛濫的反理性主義的逆流。反理性主義是獨占資本的意識形態。在這種反理性主義的逆流中，哲學方面表現為直覺主義，神祕主義，唾棄客觀的視察與思考而推崇朦朧的直覺與盲目的意志；政治思想方面表現為對民主政治之懷疑而以馬基佛里的唯力主義為聖經；經濟思想方面表現為庸俗的效用價值說，充分地表露其市儈與不勞而獲者的觀點。在這裏，披着現代化的外衣底所謂「社會價值論」，便是它的代表之一。爲了篇幅之限制，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就限於這個理論。

二 關於價值

讓我們借用杜林先生一句話吧，『價值論是決定經濟學體系的價值之試金石』，社會價值論者亦是同意這一點的。因為它不但企圖以此去建立其經濟思想的體系，而且企圖以此去建立其革命理論的體系。

社會價值論的特點有四：

第一、價值就是效用。『一種物品之所以有價值，以其能滿足人類生活上或種需要』，更明白說：『凡是那些事物對於人類生活能發生維護的作用的時候，我們就說它們有價值。所以價值是對人類生活上有作用的東西。太陽光、空氣、雨水、五谷、草木、鳥獸……我們可以說它們是有價值的東西』，把使用價值當作價值，把使用價值與價值混在一起，這是庸俗經濟學者的拿手好戲。奧國學派的所謂邊際效用說，早就把這一點造成它的體系了。是的，使用價值是商品交換的一個必需的條件，但是，它是不能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的，它是不能決定交換價值的量的。馬克斯說得很簡練：『當作使用價值，各種商品是在質上各不相同的；但當作交換價值，牠們祇是在量上互異而已，並不包含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這一個矛盾，社會價值論者是無法克服的，於是他們就不得不另找出路了。它說：

「但是像現代的經濟學家說起來，對於雖然在人類生活上而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自然物品，雖然具有使用價值，但是沒有交換價值，如空氣與日光，不能說是有價值。價值是需要人類耗若干時間用勞動力工作後才能得到的事物所具有的東西」。在這裏我們可以進而看見：

第二、價值就是生產者「所耗的勞動力」。例如「一條魚從河裏捉起來，魚的價值就等於漁夫所耗費的勞動力」。不說勞動而說「勞動力」，可以證明商品的價值，在社會價值論者眼中，是由生產這些商品所必需維持工人的費用來決定的。在現社會中，這就是由工資來決定的了。可是這種說法是矛盾的，因為「勞動者所生產的東西以及他的勞動力所化的費用，正好像機器所產之物及機器本身價值一樣，是兩種不同的東西」。工人在十二小時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價值，是和他在此勞動時間內及其後休息時間內所消費的生產資料的價值完全不同的。在這些生活資料內，按勞動生產力發達程度，可以包含三小時四小時或七小時。假定這些生活資料的生產需要七小時勞動吧，則據俗流派這種主張，十二小時勞動的產品，具有七小時勞動產品的價值，那末，十二小時勞動就等於七小時勞動了，十二便等於七了，這不是笑話嗎？

第三、價值是「人類歷史社會勞動之積累。包含有生產工具的創造、新式生產工具的進步的生產性、技術的進步、土地的開墾等等」。更明白說：「從生產過程中，尤其是引用新式生產工具以後的生產過程中，是會生產一部份為直接參加生產者所能生產的價值以外的價值」。依此而言，生產工具

是會產生價值的了。但，事實上是不是如此呢？不，絕對不是如此。

生產工具的進步，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可以使勞動者在一定的時間中比以前產生更多的東西。但是，這裏增加的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每個商品單位的價值不但不會因勞動生產率之提高而增加，反而因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降低。馬克斯說得很明白：

『生產力的變化，如足以增加勞動強度，從而增加勞動所生產的使用價值量，並縮短這較大量使用價值的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總和，它亦就會減少這較大量使用價值的價值量』。

這是以生產手段（包括生產工具在內）僅以自身所有的價值，在生產過程中轉移到生產物的新形態上為前提的。更明白說，『用生產手段附加到生產物上去的價值，決不能比它原有的價值更大。它原有的價值量和它所參加的勞動過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無論一種勞動材料、一種機器、一種生產手段，怎樣有用，假如它祇費一百五十磅，或五百勞動日，它轉移到總生產物去的價值，總不能多還到一百五十磅以上』。社會價值論者的錯誤，就是分不清生產手段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就是弄不清勞動過程中各種因素之參加生產物價值的形成，是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就是弄不清生產物的價值構成部份，有的是轉移，有的是新加。然而這種錯誤，還不是社會價值論者獨創之見。在很早以前，薩伊爲了要說明剩餘價值（利息、利潤、地租）的起源，早就說它是生產手段（土地、工具、皮革等）依其使用價值，在勞動過程中提供的生產服務之結果。社會價值論者正是以這一點來說明利息利潤和

地租等範疇的，可惜他們所走的，恰恰是薩伊已經走不通的道路。

第四、價值之形成，『消費者也有成份的』。理由是：『如果對於一種商品沒有衆多的消費者購買，那種商品，便不會多量的生產了出來，一家工廠所生產的商品找不着顧主，工廠是會關門的，而一旦所生產的商品能够暢銷，則工廠便能利用全部生產力來增加生產，從而所獲利潤也就可以更多了起來』，『社會價值論』者，想利用這一點來證明商品的價值不完全是由於生產者的勞動，但它的內容，不過只提到商品的價值必需經過流通過程使其實現出來而已。消費者購買商品，只是使廠主的商品轉形爲貨幣，使包含在商品中的價值實現出來。在這裏，因爲供求之關係，有的賣主可以高於價值的價格賣出其商品，多得一點貨幣，但從全社會的立場看來，求過於供與供過於求的現象是配合地存在着。因之，有的部門以高於價值的價格賣出，有的則以低於價值的價格賣出，從社會全體的商品言之，價格是環繞價值的水平而上下的。所以，流通過程並無增加價值。消費者對於價值之『有成份』，真不知從何處說起。如果說，消費者的主觀效用是價值的泉源，消費者在消費中對於商品的享受是評判價值的標準，則毅然膺服奧國學派的邊際效用說好了，似不必抬出什麼社會價值論也。

杜林先生有五種價值，我們的社會價值論者亦有四種價值。第一是由客觀效用產生的價值；第二是由『所耗的勞動力』形成的價值；第三是由生產手段產生的價值；第四是由消費者所提供的價值。『真是豐富的選擇，十足的混亂』。如果要下一按語的話，那我們只能說：社會價值論者只是在盡其

混亂價值與使用價值，混亂勞動與勞動力，混生產物中價值之轉移與新生，混亂價值的生產與實現的能事而已。這樣的紛亂自然會使他們說「價值是沒有實體的東西」了。

就是退一步不去根究「社會價值」本身的矛盾而依着它去分析商品的價值吧。如果說一件商品之產生——例如皮鞋，不但包含有鞋匠的勞動，而且有包含鞣皮、牧牛、製釘等等的勞動。不但包含了鞋匠、鞣皮師、牧牛者、製釘者所新加於其產品上的價值，而且包括了機器或工具等等所轉來的價值，那末，這是勞動價值論所早已主張的，馬克思的資本論不是明明白白在把這個道理告訴我們嗎？如果以為商品的價值，是包括「人類歷史社會勞動之積累」的，那末，我就要問一問：商品的價值是怎樣決定的？這種「人類歷史社會勞動」的單位是什麼東西？或許社會價值論者會提出時間作為回答吧（因為他們常說「價值是需要人類耗若干時間用勞動力工作後才能得到的事物所具有的東西」）。但是人類歷史社會勞動到底有多少時間呢？那只有天曉得！

商品的價值絕不是由那種既包含效用又包含勞動的「社會價值」所決定，而是由產生它們的社會必需勞動時間決定的。馬克斯說：

「一個使用價值或有用的貨財之所以有價值，完全是因為有抽象的人類勞動對象化或物質化於其中。然則價值量如何去測定的呢？顯然是其中所包含的那種形成價值的實體底勞動量去決定，但勞動量以勞動時間去測定，而勞動時間則又以時日等等去測定。」

如果商品的價值，由其生產所支出的勞動量決定，或許有人會以為勞動者越是懶惰越是不熟練，他的商品將越是有價值了，因其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將越多。但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等一的人類勞動，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的支出。社會的總勞動力，表現為商品全體的價值的，雖由無數個勞動力構成，但在此，它是被看作一個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的。不論那一個人，只要他的勞動的勞動力有社會平均勞動力一樣的性質，且當作社會平均勞動力來作用，換言之，只要他的勞動力生產一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不比平均所必要或社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更多，它便是同一的人類勞動力。社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即是在社會標準的生產條件下，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生產一個使用價值所必要的勞動時間」（資本論第一卷第四十五頁）。

這個科學的真理，絕不是庸俗派的「理論」所能駁得倒的。

三 利潤，資本主義生產

社會價值論者的價值論，其最中心之一點，是在證明資本家的利潤與地主的地租，不是由於剝削工人農民的剩餘勞動，而是取自人類歷史的社會價值；亦就是說：資本家的利潤並非僅僅該工廠所雇的工人所單獨產生的。讀者們，讓我們看看社會價值論者怎樣去找尋利潤的來源吧。

根據社會價值論的主張，「在生產工具的生產性還是十分低微的時候，資本家的利潤有三種來

源：（一）賤價購買原料；（二）賤價付給工資；（三）高價出售生產品」。總而言之，「社會價值論」者之所謂利潤，完全是以破壞價值法則為前提的。但是，事實上，資本階級的利潤之形成，斷不能是因為買者購買商品，低於他們商品價值；而賣者出賣商品，則高於我們價值。因為在這二個場合上，每人一定是買者，同時又是賣者，所以每人的利潤與損失，應該兩相對消。剩餘價值也是不能是欺騙的結果，因為欺騙祇能犧牲一人，富足別一人，但總不能增加兩人所有的總數目，所以不能增加流通價值的總額。「一國資本家階級，整個說來，是不能自己欺騙自己的」。〈恩格斯反杜林論〉。那末，「社會價值論者」的「社會價值」不是成為畫餅充饑的餅了嗎？

同時，社會價值論者之這種說法，完全把歷史的時代限界取消了。如果資產階級之利潤是以破壞價值法則而來，那末，怎樣把現代資產階級與中世紀的商人區別出來呢？怎樣表現出資本主義制度的特點呢？這是社會價值論者所不願意理解，而亦無法解決的。這種六十六年前杜林先生所犯過的錯誤，人們却把腐朽當作神奇了。事實正是逆着社會價值論者的主觀：一定的價值量，祇在增殖及造成剩餘價值之時，才變成資本。利潤就是剩餘價值的一個特殊形態。它是有時代性的。「社會價值論」者不願意理解這一點，與杜林先生一般，「喪失了任何經濟分析的銳利性，消滅了識別力以及任何真正的概念的用法」。

更進，社會價值論者以為產業革命以後，利潤的來源有着新的因素，這就是機器，他們說：「在新

式磨粉機器的旁邊，使得一個工人能生產比以前用手磨增加二萬倍的麵粉。這是擁有磨粉機的資本家所應私有的利益嗎？或者說，這些利益，完全是那些麵粉工人所能產生的呢？兩萬倍於以前的麵粉的價值，顯然是機器所產生的。這就是說，現代產業資本家的利潤，是機器所產生的。依此而言，資本家並未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資本家只是掠奪生產手段的價值而已。但是，事實上正如我們在上面所指出的，生產手段所轉移給新的生產物的價值，是不會超過生產手段本身所原有的價值的。生產手段對於新的生產物既然只是轉移其本身的價值，則資本家顯然不會從它們獲得利潤。上面所舉的例子中，機器比以前產生兩萬倍的麵粉，只是增加兩萬倍的使用價值而不是增加兩萬倍的價值。社會價值論始終不肯弄清這一點，因而發爲『我們能說必需勞動與剩餘勞動爲一與兩萬之比嗎？』和『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分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呢？』等反問。其實這是很明白的。資本家每天以一定量的貨幣，購買工人的勞動力。勞動力的價值，是由勞動者爲維持自己能夠工作的狀態以及爲傳種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之生產，需要多少勞動時間來決定。假定這種生活資料，每天代表六小時勞動時間。如果資本家付給工人以代表六小時勞動的貨幣數目，則他是付給工人以其勞動力每天的全部價值的，並不像社會價值論者的想像一般，以賤價付給工資，資本家付了勞動力一天的價值，所以這天內勞動的使用權，整天的勞動，也就屬於他了。勞動力的消費在一天內所造成的價值——十二小時，比它自己的每天價值——六小時，多了一倍。在這裏六小時是必需勞動；六小時是剩餘勞動，在機器發明以前的

工場手工業中，工人的每天工作時間的構成是如此；在機器發明以後的大工廠工人們每天工作時間的構成亦是如此。更明白的說，不管在工場手工業也好，不管在大工廠中也好，不管資本家是施行絕對剩餘價值的剝削也好，不管資本家是施行相對剩餘價值的剝削也好，工人在資本家工廠中每天的工作時間，都可分爲必需勞動與剩餘勞動二部份。絕不是：工場手工業的工人每天工作時間都是必需勞動，而在機器生產之下工人的勞動除了相當於工場手工業的工人每天的生產量之外，才成爲剩餘勞動。這種曲解，與西尼耳先生的「最後一小時」，可稱異曲同工！這種曲解不是證明社會價值論者之惡意中傷，就是證明他們之愚昧無知。

社會價值論者全部的努力，就是在論證剩餘勞動或剩餘價值之不存在。然而歷史先生所昭示的正恰恰與這種說法相違背。試問奴隸主的財富若不剝削自奴隸是那裏來的呢？封建主的財富不剝削自農奴是那裏來的呢？現代資產階級的財富不剝削自無產階級是從那裏來的呢？竊如杜林先生亦承認任何形式的剩餘勞動，無論是奴隸勞動、農奴勞動，或雇傭勞動，都是從來一切統治階級的收入來源，然而「社會價值論者」却一口咬定沒有剩餘勞動，沒有剩餘價值了。他們不但論證資本家沒有剝削剩餘價值而且論證工人的剩餘勞動是資本家所不需要的，他們說：「剩餘價值論的缺點，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美國暴露得最清楚，那裏大批工人自工廠中趕出來變爲失業者，得不着一片麵包，證明他們的剩餘勞動爲資本家所用不着了」！事實明白得很，失業工人之存在，不是證明剩餘價值論之不確，而是

證明資本主義佔有與社會生產之矛盾，而這樣的矛盾是以剝削剩餘價值的資本的擴大商品再生產爲內容的。社會價值論者否認剩餘價值的這種勇氣顯然是比杜林先生還來得有勁的！可惜這種勇氣無法掩蓋自己的破綻，在另一地方不得不承認，「資本家所剝削以據爲已有的部份是人類社會勞動的積累，而非僅所雇工人的剩餘勞動」。好吧，「人類社會勞動的積累」是包含工人的剩餘價值的，除了工人的剩餘價值以外的人類社會勞動的積累是什麼呢？這不是資產階級用暴力所劫取的原始積累嗎？不是剩餘價值之資本化嗎？社會價值論者只不過是把這些概念弄糊塗一點冠上「人類社會勞動的積累」的「美名」而已，這與杜林先生之偷竊羅特盤多斯（Roggen）的名稱來稱呼他從馬克斯所偷得的剩餘價值，一樣的無聊。我們恭賀社會價值論者利用馬克斯的勞動力而獲得這種純收入，但不得不指出他們用「人類社會勞動積累」的名稱，併吞馬克斯的剩餘價值，而給它以錯誤和執拗的敘述。

還有更笨蠢的，社會價值論者只知道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的利潤，而不知道獨占資本時期的獨占利潤。他們說：「美國飛機製造業在一九三七年的利潤率爲百分之三百六十，這樣高的利潤的來源雖然不僅是剝削自飛機工廠所雇工人的剩餘勞動，而是技術的進步與生產力之擴大向落後民族剝削得來」。這種說法，只有使一些未讀過經濟學教科書的小學生可以相信，如果平心靜氣地去理解平均利潤的法則，如果平心靜氣地去理解伊理奇的帝國主義論中對於獨占資本之分析，那一定可以明白：獨占資本之出現，獨占利潤之形成，絕不與馬克斯剩餘價值論相矛盾。馬克斯在批評李嘉圖直接地把統

剩餘價值率的法則與統制利潤率的法則混淆起來的時候，早就指出「同一的剩餘價值率可以表現極其不同的利潤率，而不同的剩餘價值率也儘可表現同一利潤率」。獨占利潤是由於資本之獨占，阻止了平均利潤率之進行所形成的。構成獨占利潤的，還是無產階級所產生的剩餘價值。社會價值論者只看見美國飛機賣給落後國家時的價格，只看帝國主義者與落後國家間商品之等價交換，而沒有看見先進國的某一獨占的生產部門與其他部門的關係，沒有看見資本家們在分割剩餘價值的過程中所引起的變化。因之，便把「獨占利潤」與「額外利潤」作為攻擊剩餘價值論的武器了。可惜這是「無的放矢」！

到此地，可我們以請教「社會價值論者」資本主義是什麼東西了。他們說：「所謂資本主義者就是由若干人藉擁有貨幣、生產手段、商品等等的東西作為資本來從事生產事業，從而出賣其成品以獲得利潤的一種社會制度」。利潤是怎樣獲得的呢？他們說：「由佔有生產手段的機器以間接掠奪」。資本家以購買工人勞動力而進行其剩餘價值的剝削叫做間接掠奪，試問還有什麼可叫做直接掠奪？是不是說：資本家掠奪了機器，機器再行掠奪工人呢？這種說法，除了替資本主義的剝削謀解脫以外，還有什麼意義呢？社會價值論者不但蒙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本質，而且挑撥弱小民族與先進國無產階級的聯系，他們說，資本主義先進國的資產階級主要是剝削落後民族為其利潤之來源，先進國的無產階級則在此中分肥，他們這種說法的動機，或許是在強調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被帝國主義所擄取，但因爲誇大之結果竟至於認爲先進國的無產階級了。馬克斯主義者絕不忽視帝國主義國家對

於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榨取。伊里奇在帝國主義一書中說：

「帝國主義最主要的經濟基礎之一——資本輸出，更加强了寄生階級這種完全脫離生產的形態，更使寄生活的印章蓋滿了那些靠榨取海外國家和殖民地而整個生活的國家」。又說：

「獨佔、寡頭政治、統治傾向的代替自由傾向，區區少數富強國家對好多弱少國家的剝削——諸如此類，產生了帝國主義種種顯着的特徵，使人們不得不把帝國主義叫作寄生的或腐化的資本主義。」

帝國主義不但剝削壓迫其國內的無產階級勞苦大眾，而且剝削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這是再明白也沒有的事。但這裏的問題是在於：先進國無產階級在這裏所處的地位是怎樣。社會價值論者譏蔑先進國的勞動者分得帝國主義從殖民地半殖民地之肥。事實上絕不如是。帝國主義所收買的只是工人階級的上層份子，只是提高少數工人貴族的工資。絕大多數的無產大眾，不但不參加瓜分這種從殖民地半殖民地所剝奪的超額利潤，而且正因為帝國主義者的瓜分殖民地，準備戰爭進行戰爭之故，吃了很大的虧。他們的麵包都被拿去換大砲了；他們的牛油都被拿去換飛機了。縱然在和平時代，在某些部門，他們的貨幣工資和實質工資比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來得高，但是從其國家的生活程度來說，從其勞動力的價值來說，從其對資本家所提供的剩餘價值來說，同樣是受剝削的。如果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工人工資來與先進國工人的工資作比較，看見先進國工人的生活比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較勝

一籌，便硬說先進國工人亦在剝削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這種說法，絕不是弱小民族革命運動的理論，而是帝國主義者分化歐美無產階級與東方被壓迫民族的革命聯系底一種最危險的毒計。

四 地租·地價

「社會價值論者」申斥土地之有價值，是社會各界人士共同勞動的結果，土地所有者只是睡覺便坐享其成。這種申斥在道德上或許是有意義的，但如果從科學上來說，這樣的申斥是未盡然的。

第一、社會價值論者抹殺了地租的真正來源。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下，在以全體農業人口完全分化為土地所有人，資本家和僱傭勞動者的前提下，農業資本家一面從地主租得土地；一面僱傭農業勞動者進行生產。僱傭工人以其無報酬的勞動生產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首先落在農業資本家手中。農業資本家將剩餘價值分為二部份：一部份是他的資本所得的利潤；一部份則為交給地主的超出這項利潤的餘額。這便是地租。馬克斯說得很清楚：「凡地租都是剩餘價值，都是剩餘勞動的生產品」。

第二、社會價值論者沒有把地主的收入與資本家的收入分別清楚。在事實上，往往地主自己僱傭工人從事耕種，這時，他既是土地所有人，同時又是資本主義的企業家，他以土地所有者的資格取得地租；以資本家的資格取得利潤。地租和利潤同落在一人的荷包裏。但是，在經濟學的範疇上，兩者

是截然不同的。資本家所得的是平均利潤那一部份的剩餘價值；地主所得的地租是超平均利潤那一部份的剩餘價值。社會價值論者沒有弄清這一點，只是漫說地主之享有土地所有權正如工業資本家之佔有新式生產工具是一樣的不合理。至於利潤與地租之關係如何呢？這是非社會價值論者所得而知的。說得尖刻一點，或許會像杜林先生一樣的聰明，把地租看作是土地所有者從土地所得的收入，而利潤則為從自工商農的收入。但是，客觀的事實却攔住了社會價值論者的去路。

第三、社會價值論者只曉得地價跟着社會之進步而上漲，但是怎樣上漲的呢？他們是沒有說明的，最多只是說：「任何地方的土地之所以有價值都是仰賴人類祖先或社會勞動的努力所由成功的」。事實很明白，如果除掉人工所造的工程和改良（如建築物，水渠，灌溉）不算外，土地本身是無有價值可言，也不能夠有價值可言。因為土地並非人類勞動的生產品。但是土地雖沒有價值，却可以有價格。它之所以有價格，完全是地租資本化之結果。地租有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之別。形成級差地租的條件有三：（一）土地的有限，造成土地經營的獨佔；（二）地味有肥沃瘠澆之別；（三）地位的便利與否。在這種情形之下，農產品的生產價格，便以劣等地的生產條件來決定，經營上等地的農戶，除了平均利潤之外，便可有額外收入。這一額外收入歸於地主之手成爲地租。至於絕對地租則是以土地私有權爲其前提的。馬克斯很扼要的說：「絕對地租乃是田地生產品的價值超出生產價格的餘額；至於級差地租，乃是位置優良的田地生產品的市場價格超出它們自己生產品的價值的餘

額」。因爲開墾的新地數量一天天增加，因爲隨着新墾地的增加，各種地段生產力與位置上的差別以及同一地段上各項投資生產率的差別，也一天天地加大，所以，地租的數量也一天天的漲大。地租既然漲大，作爲地租資本化的土地價格，自然亦跟着漲大了。社會價值論者只能說地價跟社會進步而上漲，不能說明地價上漲的內容。

社會價值論者常常引用都市地價高漲作例子，企圖以朦朧的說法來抽去地租的真正來源。其實，這是徒勞無功的。馬克斯在資本論第三卷第六篇第四十六章中說：「在有地租存在的地方，總有級差地租，並且那種地租總是依照農業級差地租的法則來規定。任何一種自然力，不問它是瀑布，還是豐饒的礦山，還是富於魚類的湖沼，還是宜於建築的地基，只要先能够被獨佔，能够對產業家（使用它的人）保證一個剩餘利潤，那些人，那些對地球一部份享有所有權而變爲這種物品所有者的人，就會在地租形態上，奪去機能資本的這種剩餘利潤。關於供建築用的土地，亞當斯密曾說明，它的地租和一切非農業土地的地租的基礎，都是由嚴格的地租規則着」。這不是給與社會價值論者以一個無法反駁的答覆嗎？

五 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勞動時間

「社會價值論」者爲了要建設其「社會主義社會」，所以討論了「剩餘價值在蘇聯的問題」。

（這樣的提法是不通的，剩餘價值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有物，蘇聯沒有剝削之存在，蘇聯的生產並不是爲了利潤爲了價值，那裏有什麼剩餘價值？）在這裏，他們引了馬克斯如下的一段話：

「祇有資本主義生產形態廢除，勞動日才能縮短到必要勞動時間的限度。但在那種場合，必需勞動將擴大其自身的範圍。因爲，在一方面，「生產條件」的概念，將大大擴張，勞動者將要求另一種的生活水準；同時，現在算作剩餘勞動的一部份，到那時亦會算作必要勞動。要造成社會的準備基金與蓄積基金，這種勞動是必要的。」

並加按語，以爲這不是瞭解蘇聯經濟事態的鎖鑰。因爲「必需勞動之擴大在生產力增進到今日如此地步的情況下，是說不通的。」

應該怎樣才說得通呢？

第一，他們說，「應該說蘇聯否定了私有制度，將生產工具收歸公有，從而能有計劃的生產分配，而不能說是擴大了必需勞動」。是的，蘇聯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作有計劃的生產分配的。但是，如果每一個成員的勞動時間，只生產等於他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試問擴大生產的基金，行政文化的建設費從那裏來的呢？如果每一個成員的勞動時間，只生產等於自己當前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試問他們的物質文化生產將怎樣改善與增進呢？生產力之提高，固可減少每一個生產物的生產時間，固可使勞動者在同一時間中產生比以前一倍二倍以至若干倍的生產物，固可使生產者每天爲產生自己

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時間縮短，假定生產力提高之後必需勞動時間可從六小時縮小至五小時，但因為生活條件改善，生活程度提高之結果，生活者所需的生活資料在質上量上都比以前增加了，再加上社會上文化養老育幼等費用，這麼一來，必需時間仍須擴大到六七小時。社會價值論者只片面地理解生產力提高可以縮減必需勞動時間，而沒有從發展的觀點去把握勞動者的生活在社會主義社會不斷地改善，沒有從全體的見地，從聯系的見地去把握影响必需勞動各方面的因素。遂生產出自己不通而說人家不通的武斷結論。

第二、社會價值論者認不清時代，把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資範疇，當作社會主義國家的工資範疇。因而說：「必需勞動既是等於「勞動力的價值，是對於維持勞動力所有者的生命所必需的生存資料的價值」，社會儲蓄與必需勞動有什麼關係呢？」這種機械的形式的觀點，是可憐得很的。蘇聯的工人階級是在自己手中的企業中做工，他們並不是與生產手段分開的，因此，他們並不是「工資勞動者」，「當作商品底勞動力」這個範疇並不存在。硬把資本主義的工資來看待蘇聯工人的工資，顯然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說法。至於規定必需勞動時間，乃是決定社會儲蓄的前提。蘇聯每一個五年計劃，不是具體的把各種基金作個規定嗎？可惜社會價值論者不願意去看這個事實。

第三、社會價值論者以為蘇聯現在所享用的，乃是「人類歷史上若干萬年所耗的社會勞動生產的價值」，而不是蘇聯人民努力的結果。從科學文化的見地上來說，當今之世，誠然只有社會主義的蘇

聯，接受了人類文化的遺產，這是資本主義國家所做不到的，但從經濟的意義上說，蘇聯的國富，是蘇聯人民努力生產得來的。社會價值論者竟起了發洋財之念，竟欲向蘇聯算賬，竟欲向蘇聯「共產」！這未免太過「那個」了！

社會價值論者所認為說得通的幾點，都是說不通的。馬克斯那一段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勞動時間的指示，正是了解蘇聯的關鍵。社會價值論者之那種曲解，只是在暴露其淺薄而已。爲了使問題弄得更清楚起見，讓我把馬克斯在哥達綱領上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錄在後面吧。

「顧名思義就算「勞動的收入」，是真正他所生產的生產物，那末，集體勞動的收入乃是社會生產物之總和。

「其中應拿出去的部份是：第一、已消費了的生產手段之補充部份；第二、擴張生產所需要的追加部份；第三、預防各種災害，天災等的預防金或保險金；……總生產的餘下部份，便拿來做消費資料。

但是進行各人的分配以前，還應抽去：一、不屬於生產的行政費。這一部份也許比目前的社會所需好的更少得多，其減少隨着新社會發達的程度而進展。二、爲滿足社會慾望，如學校、療養所、衛生設備等部份。這一部份不用說比目前的社會所需要的要多得多，而其增加隨新社會之發展的程度而發展。三、沒有勞動能力的人的扶養金……即目前社會之所謂貧民救助費。然後才

開始分配。」

社會價值論者大言不慚地說，只有他們才願管到社會上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剩餘價值論者是不去解決這一個問題的。馬克斯這一段話，給與這種不慚的大言以無情的打擊。

六 狂妄而不負責

這就是我們對於社會價值論者關於經濟方面的批評。但是，社會價值論者的妙論還不只此。除此之外尚有「資本主義世界是以先進國與落後民族作爲主要矛盾」和「弱小民族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等等，爲了篇幅的限制，就讓我們在此打住吧。

如果要把上面所已檢討過的問題，作個總的斷語，那只有借恩格斯送給杜林先生的話：「因誇大妄想而毫不負責」。

一九四一，三，廿八。

關於購買力平價說

一 購買力平價說的要點

購買力平價說導源於十九世紀初英國正統學派的李嘉圖氏（D. Ricardo）。然而把這一見解組織成爲有系統的學說的，却有待於瑞典斯篤克哈姆大學教授，和一九〇二年國際聯盟財政會議的委員長卡薩爾（O. Cassel）。卡薩爾於一九一六年三月在經濟雜誌上開始發表其購買力平價說；一九二〇年，國聯在布魯捨拉開國際財政會議的時候，他又製成備忘錄，應用他所提的這個購買力平價說，作爲解決當時的國際匯兌的根據。差不多從這個時候起，他便成爲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研究國際金融的泰斗；他的購買力平價說便成爲支配國際匯兌原理的權威了。

購買力平價說是以禁止金輸出的場合，作爲其背景的。在各國保持金本位，現金輸出保持自由的狀態的時候，各國間的金幣，各含着一定量的純金。在這裏，國際匯兌，雖然在現金輸送點之間上下波動，然而各國間貨幣的平價是容易地可以求得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法定標準金一盎斯鑄造金幣三磅十七先令十個半便士。美國法定純金一盎斯鑄造二〇·六七金元，每磅所含之純金與美元四·八六五元所含之純金相等，故英美匯兌的法定平價，一磅便等於四·八六五美元了。但自各國

廢除金本位之後，國際金融的現象，變得更複雜。在這時候，各國所用的不是金幣，而是不兌換的紙幣。就現象形態來看，紙幣本身是無有價值的，紙幣與紙幣之間，是無有平價可尋的。迷惑於這種狀態，於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便去尋求其所詔「新匯兌理論」了，卡薩爾的購買力平價說就是在這種環境之下，產生出來的。

購買力平價說的內容是什麼呢？簡單說來，是各有獨立紙幣的兩個國家間，其匯兌市價，以兩國貨幣（不兌換紙幣）對內購買力之比，即物價之比，作為標準而決定。（這個標準叫做購買力平價）。如果某一個國家，紙幣膨脹，致購買力降低，則這個國家的貨幣匯價，必定與它的對內購買力之降低，作正比例的跌落。打個比方，「有帽一頂，在英國賣英幣一磅；在中國賣法幣十六元五角五分，則中國法幣十六元五角五分，與英幣一磅可稱平價。倘中國貨幣流通量增加一倍，帽價每頂漲至三十三元一角，英幣情形不變，則中英平價將變為三十三元一角等於一磅，因中國法幣購買力跌落一半，故法幣對外匯兌數量加倍。反之，倘中國貨幣流通量減少一半，帽價每頂跌至八元二角七分五厘，中國對英之匯兌平價數將減少一半。」在這裏，應注意的條件有二：

第一、計算購買力平價，并非一般物價指數，而是國際流通貨物的物價指數。「因為國內流通之貨物，其價格之變動，僅能影響本國國民之購買力，與外國國民不發生影響，故亦不能影響外國匯兌。外國國民所注意者，取得中國法幣後，能購買彼所欲購買之貨物多少？所以，計算購買力平價的

物價指數，應以出口大宗的物品。

第二、出口貨的運輸費，保險費以及關稅等，均應計算在內。

二 使用這一學說的場合

應用購買力平價說來說明法幣的外匯，已經受到某一部分經濟學者的批評了。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一日重慶國民日報的星期增刊『戰時經濟專刊』——國民經濟研究所編——第十七期上，千里先生就有一篇討論『購買力平價說適用的場合』的文章，他指出『購買力平價說適用之場合，須有下列數種客觀條件：（一）在戰後有和平環境；（二）自由政策；（三）金屬貨幣；（四）匯兌市場并未統制；（五）物價之上漲由於貨幣的原因而發生。如備有上列五項客觀的條件，始能便於使用。目下我國現狀，與上列五項條件，完全不同』。因而反對購買力平價說應用於中國今日之場合，千里先生這樣審慎的態度，與不願實際盲從卡塞爾的主張者，截然不同。但是，從這篇文章的內容看來，我們認為倘有些缺憾的地方。

千里先生的文章，除歐戰後各國的經濟狀況，和我國今日的經濟狀況，有些不符於事實（如無視戰後的資本主義是處在相對的暫時的穩定時期；無視當時的國際貿易已一步步走上不自由的道路；無視戰後各國的幣制是憑依於英美的釘住政策；無視今日我國之物價，其上騰之原因是由於法幣之膨脹

等等）之外，其主要的缺點，就是只提到適用購買力平價說的場合，而未嘗討論到購買力平價說本身。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千里先生仍然是同意購買力平價說的，不過限制它的使用場合吧了。加上這一限制，固然縮小了這一學說的活動範圍，然而這種限制，是未能絲毫地動搖購買力平價說的基本論點的。

那麼，從那裏去看出購買力平價說的錯誤呢？

三 貨幣數量說的錯誤

依上面所說，購買力平價說，所欲說明的是：各有獨立紙幣的兩個國家間，其匯兌市價，以兩國貨幣（不兌換紙幣）對內購買力之比，即物價之比，作為標準而決定。而各國的不兌換紙幣，本身不過一張印刷的紙，無絕對價值，全視其發行的數量之多寡而定。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購買力平價說是以貨幣數量說作為其基本前提的，同時，購買力平價說的基本主張，乃是「兩國貨幣對內購買力之比」。因此，在批評這一學說的時候，我們的注意力，不能不集中在貨幣數量說和「兩國貨幣對內購買力之比」二點。

貨幣數量說以為貨幣的購買力，是在流通過程中完成，其購買力之大小，是依存於投入流通過程中與商品交換的貨幣數量。因此，其他的情形不變，投在流通界的貨幣數量越多，則它的購買力就

越低；反之，投在流通界的貨幣量越少，則其購買力亦就越高了。主張這一說法的人們，常常利用紙幣的發行量越多，則紙幣的購買力愈跌落一件事，去證明其理論之確實。

貨幣數量說的錯誤，在於不了解紙幣的本質；在於弄錯了貨幣的作爲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機能；更根本的說，在於否定了貨幣內在的價值，抹殺了商品生產之內在的矛盾。現在依次述於下：

第一、紙幣只是在流通界中貨幣的代表者。爲紙幣所代表的價值，不外由紙幣與爲流通所必需的金幣量的比例去決定，而爲流通所必需的金幣量則依存於處在流通界的商品之價值與黃金的價值。至於黃金之所以能測度一般商品的價值，那不外是因爲黃金本身具有代表物化了的社會勞動之價值。因此，爲每個單位紙幣所代表的價值，並不依存於流通着的紙幣本身的片面的數量。

紙幣的本身是無有獨立價值的，所以，它不能執行貨幣的基本機能——價值尺度。在這裏，就是在紙幣流通的局面之下，這一機能仍然爲金幣所執行；就是在流通界中完全沒有金幣的地方，黃金經過商品（在黃金停止以前，商品的價值是由黃金體現出來的）形成價值尺度的作用；同時黃金經過金塊與個別商品交換和經過國際貿易，亦可把價值尺度表現出來。在某一國家使用紙幣時，這個國家的貨幣的對外匯兌，是依存於這個國家的以紙幣爲代表的黃金價值。貨幣數量說的錯誤，在於無視紙幣是金幣的代表者，抹殺紙幣的購買力是取決於紙幣與爲流通所必需的金幣量之比例。他們看見某些國家使用不兌換紙幣，就被這種現象所迷住，因而沒法更進一步地去把握這一現象裏之本質。

第二貨幣價值與商品價值，皆在商品與貨幣出現於流通界以前，在生產過程中造成的；交換只是把包含在商品與貨幣之中的價值表現出來而已。馬克斯在論及貨幣的價值尺度的時候，很明白的指出：

「不是因為有貨幣，所以商品有公約的可能。正相反，是因為一切商品，當作價值，都是對象化的人類勞動，所以它們有公約的可能。所以它們的價值，能由同一特殊商品來計量。所以這一個特殊的商品能轉化為共同的價值尺度，即貨幣。」

貨幣數量論者的錯誤，是在於無視貨幣價值與商品價值皆在生產過程中形成，是在於抹殺價值尺度的機能乃貨幣的基本機能。因此就主張「投在流通過程中的商品無價格，而貨幣無價值；」因此，就把流通手段的機能，作為貨幣的基本機能；因此，就在流通過程中去找尋商品的價值和貨幣的購買力了。

第三、貨幣數量論者之所以主張「投在流通過程中的商品無價值，而貨幣無價值。」是因為他們一口否定貨幣內在的價值；他們之所以否定貨幣之內在的價值，是他們抹殺了商品生產之內在的矛盾。這是一切流俗的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特點。

我們知道：「商品價值的對象性，與商品體的感性的粗糙的對象性，正相反對，它不包含一個自然物質的原子。無論我們怎樣翻檢一個商品，它，當作價值物仍是不能把握。但我們且記着，商品在

表現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時，才有價值對象性，它們的價值對象性，既然純是社會的，則很明瞭，這對象性也祇能表現在商品的社會關係上」（資本論第一章）。商品的價值對象性，為什麼純是社會的呢？這是因為商品生產者底私的勞動與這勞動之社會性間的矛盾所表現出來的。

在商品經濟中，商品是在私的企業中產生出來的。各個商品生產者不與別的生产者協議其行動，雖說他依存於個別生產者，雖說其勞動一開始即帶有社會性，但他與個別生產者分離的生產着，他們不能預知其勞動在社會勞動底全體系中佔有什麼地位。所以，商品生產者底勞動怎樣表現為私的勞動，其商品只直接表現為私的勞動底生產品。當生產品尚未出現於市場且未與別的商品交換時，商品生產底私的勞動之社會性一直隱含着。在市場上經過各個商品生產者底勞動生產品之比較，先前含着的东西才顯露出來，才表現出：握有各種使用價值且為具體勞動所造成的，被交換的商品，其本身包含着抽象之相同數量且握有相同的價值。換句話說，在商品生產之下，每個社會成員的工作，一方面是社會勞動總和的一部份；一面又是各個工作者的私人工作——個人勞動，這種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間的矛盾，這種商品生產底私的勞動與這勞動之社會間的矛盾，就是形成價值的社會根源。貨幣數量論者是抹殺這一根源的，因此，他們無視商品的內在的價值，否認了商品的價值對象性表現在商品與商品的社會關係上，否認了貨幣的本質是一種特殊商品，因而在流通過程中的貨幣數量去推論貨幣的購買力了。

作爲購買力平價說的基石底貨幣數量說，是這樣的錯誤；現在，讓我們更進一步，去看看「兩國貨幣購買力之比」是什麼一回事吧：

四 關於「兩國貨幣對內購買力之比」

購買力平價說者之所以提出「兩國貨幣對內購買力之比」，是因為「外國國民所注意者，取得中國法幣後，能購買外所欲購得之貨物多少。」在這裏，是需要共通的商品作爲中介的。例如在上面所舉之例子，有一頂帽子在英國賣一鎊，而在中國賣十六元五角五分，在這種場合之下，一鎊才等於十六元五角五分法幣，但在實際情形中，問題是并不如此簡單的。我們知道中國出口的東西是生絲、棉花、桐油、雞蛋、茶葉、豆類及豬鬃，而英國出口的是棉織品、機器、軍伙，及其他工業等等。在這種情形之下，中英之間，是無有共通的商品作爲決定外匯之標準的。一頂帽子在英國賣一鎊而在中國賣十六元五角五分，在事實上，必定是在英國製造而輸入中國的帽子，并不是中英二國同時產生同一質料同一價格的東西；必定是依存於中英匯率以一英鎊的價格成爲法幣十六元五角五分然後去決定中英匯率，由此言之，購買力平價說是失去了規定二國間的匯率的商品標準的，是倒果爲因的。根據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落後民族間的不等價交換的事實，我們可以說購買力平價說者這種理論的作，明明是在掩蓋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的搶劫行爲，是在掩蓋這種吸盡產業落後國家的血液的

不等價交換的行爲！

就是把二國間出口貨物的物價指數作爲標準吧，問題依然是不能解決的。因爲構成各國出口物的價值指數，其商品并不完全相同的。購買力平價說者，雖然能够將兩國間的物價指數推算出兩國貨幣的匯率，但是，他們從什麼地方去推證兩國出口物的價值指數有共通的單位呢？他們是否認商品有內在的價值的，在這種否認之下他們從什麼地方去找出兩國間共通的商品單位作爲推算兩國間的貨幣的匯率的前提呢？

購買力平價說者之所以提出「兩國貨幣對內購買力之比」，無非是藉此企圖離開黃金來說明國際匯兌的現象；無非是藉此企圖抹殺貨幣有作爲世界貨幣的機能。這明明白白的是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使用紙幣的現象所迷住着的一種皮相的說法。在使用紙幣的場合，我們固然亦主張：購買該國貨幣單位的匯價將依存於紙幣的行市。但是這種所謂紙幣的行市，并不是如購買力平價說所主張一般，是離開黃金而獨立把紙數量與商品流通量作對比，而是依存於爲該國的紙幣所代表的黃金幣值的。這是一國幣值匯價的水平，至於每日行市的變動，自然是要受着國際貿易的波動，受着國際貨幣供求，受着恐慌、戰爭與荒年等因素所影響的。

五 被紙幣現象所迷住的俗流見解

這便是購買力平價說的貧困之處。從貨幣對內購買力來說，貨幣數量說是無視商品生產之矛盾性，抹殺商品和貨幣的本身價值的；從兩國貨幣對內購買力的對比來說，購買力平價說是失去了作為兩國間規定匯率之共同基礎的。從這兩國基本條件的檢討，我們可以說購買力平價說，乃是一種被紙幣的現象形態所迷住的俗流見解。

一九三九·六·二十一·在重慶

所謂人性論

一 用人性代替欲望

在布爾喬亞的經濟思想中，「欲望」與「人性」二個概念，演着極其重要的角色。

欲望是主觀主義的經濟學派的出發點。代表着最反動的金融寡頭的奧國學派的邊際效用論，就是以「個人的欲望」，作為這一學派全部經濟理論的基石的。依據這一學派的說法，各單位貨財的價值之大小，是由邊際效用決定的，而實際效用的大小，又是依靠着它的欲望的意義或強度去決定的。這就是說，價值的根源是效用和欲望，而效用又是決定於人的欲望的，如果抽去了「欲望」這個因素，則整個奧國學派的經濟理論，便無立足之地了。這是資本主義沒落期的胡調。但是，當布爾喬亞的經濟思想仍為科學的時候，情況並不如此。古典學派的鉅子李嘉圖就沒有這種氣味，他主張以勞動時間決定價值，他「嚴格地堅持物品價值底增減有賴於它們當中所消費的勞動底增減這一原則」。如果有人說古典學派的經濟思想，亦以人類欲望為立論之本源，那是不合事實的。如果把這種說法去套在馬克斯的頭上，（以全體主義為招牌的法西斯經濟學家。斯班及其徒輩就是這樣說的。）那就更不合事實了。馬克斯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是從商品開始的。商品是存在於我們外界的一個對象。他雖

然說過一個商品可以滿足人類某種欲望的話，但他馬上接着就說，「這種欲望無論性質如何，（比方說，無論是從胃臟起，抑是從幻想生），都是一樣的。這物是怎樣滿足人類欲望呢？是直接當作生活資料呢？或是間接當作生產手段呢？我們在這裏亦是無須過問的」。就是談到物的效用，他亦很明白的指出：「這個效用決不是浮在空中的，它是受商品體的性質限制着的，故離商品體即不存在」。從這一段話，就可以明晰地看出馬克斯的勞動價值論的出發點是什麼了。怎能把主觀主義的「欲望」，當作是他的立論的本源呢？

以欲望為出發點絕不合於社會經濟的實況。所謂欲望，乃是一個心理上的作用，因之，以欲望作為前提的邊際效用說，是離開了現實社會而以個人心理為中心的一種幻想。實際上，我們現在所過的經濟生活，決不是離羣索居的魯賓遜式的生活，而是一種社會生活。我們個人的生活和意志，是受着獨立於我們之外的社會經濟的規律所制約的。馬克斯說得很明白：

「我們向歷史中之追溯愈深，則個人，因而亦就是非獨立的生產的個人，愈見是附屬於一個更大的總體；最初是極自然地屬於家族，屬於發展成為種族的家族；繼後是屬於由種族之抗爭與融合所產生出的種種形態的集團。到了十八世紀，在這「有產者的社會」中，各種社會的關係之種種形態，對於單獨的個人，才成爲了他私人目的的單純的手段，才成爲外在的必然。但是這個時期，這把單獨的個人之立場製造出了的，正是歷來最發達的社會的（由這立場而言是一般的）」

諸關係之時期。人是真正如字面所表現底政治的動物，不僅是一種社會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單獨化的動物。在社會外的單獨的個人之生產——這是在動態中已經具有種種社會力的文明人，偶然被飄流到絕境時所能有的一種意外事——就如言語發展之不待有共同居住共同說話的人一樣，是同等的不通。這是無庸多作糾纏的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

這是馬克斯在批評亞當斯密與李嘉圖以離羣索居的獵夫與漁夫作為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時，所說的一段話，這段話，亦可移來批評奧國學派的邊際效用說。但在這裏，古典學派的這種美的幻想是與奧國學派不能劃一等號的。「亞丹斯密與李嘉圖的獵夫與漁夫，無甯是自十六世紀以來已經培育着而到十六世紀便一躍而達到成熟之域的，那「有產者社會」之先聲。在這自由競爭的社會裏，單獨的個人好像脫離了自然束縛及其他的羈絆。這些羈絆在前幾期的歷史階段中是把個人束縛在一種限定了的人的集團裏」的。亞丹斯密與李嘉圖把歷史發展的產物認為是歷史的起源，認為是先天存在的理想，這顯然是乾燥無味的想像，不過這種想像，畢竟還有進步的意義，因為這種十八世紀的「個人」，乃是封建社會解體和十六世紀以來新發展的諸生產力的成果，反之，奧國學派所用作為出發點的所謂沙漠中的旅行者，却完全是資本主義沒落時那些寄生的腐爛的金融寡頭的杜撰。這個食利階層，是以「剪息票」為主的。他們完全不參加任何企業，而專以懶惰為職業；他們的生活是完全與生活過程隔絕的。所以他們就在虛無縹緲的心理現象中玩花樣，他們只知有消費而不知有生產，他們的

思維便以抹去客觀性和現實的社會關係的個人主義為基點。所謂沙漠中的旅行者，不外是這些腐化墮落的寄生蟲，酒醉跳舞之後，坐在沙發上的幻想吧了。這樣的一種想法，怎能與生氣勃勃的亞當斯密與李嘉圖時代的布爾喬亞同日而語呢？

奧國學派以欲望為立論的本源，顯然是以個人的消費為出發點的。這種看法是與客觀事實走着正相反對的道路。試想想吧，無對象的消費，能成其為消費嗎？如果沒有生產，消費的物質對象是從何而來的呢？而且生產替消費所製造的，不僅是對象物，而且規定了消費的方法；生產不僅給與欲望以物質，而且在消費者心中，把已將造成為對象物的生產品作為欲望而喚起着。「所以，生產是產生消費的對象，消費之方法，消費之衝動」。在這裏，我們固然不能忽視消費與生產的辨證關係，不能忽視「消費生產着生產者的素質」。然而無論如何，物質的生產是主要的，而奧國學派却以抽象的個人的消費為出發點。由此可見他們的全部經濟學說是建立在沙灘之上的。

以欲望為出發點，自然使經濟學的討論，把「人與物的關係」作為對象。奧國學派的主將龐巴衛克（Bohm-Bawerk）所說的「一切的財貨，都是無例外地置放在對於人類的幸福之一定關係上」，就是例證。在這裏，一方面是財貨，一方面是「人類的幸福」，這不是人和物的關係嗎？要抹殺現實的社會關係，當然要用人與物的關係去代替它。這是科學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敲起喪鐘以後，「司空見慣」的事情。但是，以欲望為出發點却又不能自圓其說，因此，聰明的人們便在鑼鼓喧天的舞台上，

另找法寶了。這就是人性（或理性）。其實，這件法寶，在經濟思想史上，並不是新的東西。很早很早，它就被人用去達成其某種目的了。

二 經濟思想中的人性論

如果細細一看，人性論在經濟思想史的發展上，是「源遠流長」的。重農學派的自然秩序觀和自然權利觀，已經或多或少的含有這種意味了，但只有到了亞當斯密，人性論才發揮了極大的積極作用。讓我們從亞當斯密開始吧！

亞當斯密剝去了重農學派加在自然秩序觀和自然權利觀的封建外衣，以為自然秩序和自然權利發生於人類的本性。人類的本性是利己的。故他特別靠經濟活動以追求自己個人的利益。既然追求個人利益是人類的天性，則這樣的追求就是合法的，因而就有存在的權利。除了一個人的利益須以別人底利益為限之外，不應有別的限制。亞當斯密的所謂人性（人底本性）。實際上乃是有產階級的本性，正確地說，乃是「那時正在轉變為資產者的那種中等市民，他們的（天性），祇是在於生產工業品並且根據那時的一定的歷史關係而經營貿易」（恩格斯反杜林論）。他之所以力說只有在自由競爭中，人類本性才得到了正常的發展，不外是在證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乃由人性所決定，不外是在證明資本主義的生產，乃是超歷史的絕對性的社會制度吧了。

亞當斯密的人性論是二元的，他的國富論說「經濟人」是自利主義者，支配人類經濟活動的只有個人利益；但他的道德情操論却又說，人類有着一種同情的情感，人類是利他主義者。邊沁及其信徒們拒絕斯密的這種二元論，把倫理觀建立在自利主義上，但十九世紀上半期，法國的庸俗經濟學者同時又是反社會主義的癡狂的戰鬥者巴師夏（J. B. Say），把斯密氏的自利和利他兩種觀念協調起來了。他肯定人類有兩種互相補充的特性：自利的特性與利他的特性，這兩種特性不但不相衝突，而且互相補充，巴師夏認現存的社會機體是自然的又是和諧的協調的，他之抱這種見解，乃是代表法國革命後的資產集團的。當時的法國，在甲可賓黨所領導的革命壓迫之下，這兒的資本集團戰慄了。他們根本否認布爾喬亞社會內利害的矛盾，所以，只能歡迎古典學派經濟學中庸俗的成份。巴師夏的人性論及其庸俗的經濟學說便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應運而生」的，便是以負担着粉飾和麻醉的任務的角色出現在當時法國的論壇之上的。

與李嘉圖同時代而代表小資產階級的西斯蒙蒂（Jean Charles L. Simonde de Sismonde）站在古典學派政治經濟學底反對派的立場，但他自己的立場亦是很抽象的。因為他是使用抽象的方法，所以其所談的，亦是「一般的人」，抽象的人。而不是在具體的階級關係中佔着一定地位的人。他所說的人是一般地「領有財富和享受財富」的人。然而事實上，這種人祇存在於西斯蒙蒂底想像中；這種人，不外是理想化的小資產者吧了。這是拿破倫的法國軍隊毀滅了瑞士的封建制度後，資本主義在那兒逐

漸發展的結果。在這種情形之下，在十九世紀初葉，瑞士廣大的小有產者面對着資本主義生產之襲擊，因而普遍地存在着阻止資本主義發展和恢復自給自足的小資產的各種幻想。西斯蒙蒂的經濟浪漫主義，就是這種幻想之理論化。如果古典學派用人性理論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之為正常和自然的制度，那末，西斯蒙蒂却咀咒這種現實，却以抽象的「人」來與古典學派的「人性」對立。認為必須按照一定的理想（小資產階級的理想），依靠國家的力量來創造的，才是正常的，自然的社會制度。由此可見：西斯蒙蒂所說的人，不但是抽象的，而且是主觀的了。

德國的歷史學派是反對古典派之以「個人的利益」作為整個理論的前提的，但他們——特別是新歷史學派，亦在「國民的特性」的招牌之下，貫徹其為資本主義辯護的目的。休摩勒爾（Schmoller）說：「當論一國的經濟生活及牠的組織的時候，不僅必要考慮這種自然條件之差異，而且必要考慮國民的特性，倫理思想，勞動心理狀態，勤儉，努力之如何，義務觀念的厚薄，以及家族生活良善與否等等之精神的，心理的方面。」德國的歷史學派反映着當時德國落後的經濟情形。為求自己的發展，當時德國的布爾喬亞必然要求德國的特殊性及其獨立存在。所以，他們便排擊古典學派所倡導的「個人利益」和自由放任的基調，而高呼以國民生活為中心的經濟思想了。所謂國民的特性，不外是穿上國家外衣的「人性」而已。更可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學派強調着倫理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他們從歷史的事實與統計的數字去肯定德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而又以倫理去維系這種現實。休摩勒爾在「德

國社會政策學會」上宣佈過：「余輩乃是一方希望在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充實道義的概念，同時，他方期冀以君主的權力圖謀資本家和勞動者的調和的人」。這段話，把這個學派的本質，完全說出來了。

如果嚴格說來，歷史學派經濟思想中的「人性論」，還不大明顯。近年在美國興起的制度學派，亦精力於歷史的資料，但其程度不如新歷史學派之甚，且他們多根據生物學，心理學，考古學及人類學。一句話，他們以其所倡的制度，作為研究的目標。衛勒倫(Thorstein Veblen)——一位奇僻而善於諷刺的「天才」，就是他們的代表。衛勒倫所根據的基本觀念之一就是「人性論」。依照這種觀念，「人是被認為一個本能的動物，而他所得的本能，在實質上，是與其他較高的動物所得的方法相同，就是由於遺傳及環境的影響，而尤以物質的環境為甚。這些本能決定他的一生的目標與方針，他天賦的智力與天性，在這「籌劃生計」中，僅僅佔一部分，因為就是在此，「傳統」及繼承的「思想的習慣」是佔優勢的。各個人及團體由於這些本能的指導及主宰，他們的行為成為習慣的，而由這些習慣的行為生產了制度；由人力利用物質環境以滿足他物質慾望而促成的行為，結果產生了經濟制度。」衛勒倫對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固然嬉笑怒罵的加以評擊，並且希望來「一個激烈的變化」，但是，這種「評擊」和「激烈的變化」，是可憐得很的！西斯蒙蒂以理想化的小資產階級去對抗古典學派的利己的人性；而衛勒倫則把人當作生物學心理學上的「本能的動物」，企圖從這種本能去改革

社會經濟制度。這還不是一種抽象的人性論麼？人不是本能的動物，而是社會的動物；「不僅是社會的動物，而且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單獨化的動物，」衛勃命却把人類當成本能的動物了，這不是抹殺人類的社會性麼？所謂人的本性，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上的一定生產方式底產物，衛勃命却以人性爲出發點去追求經濟制度發展的法則，這不是倒果爲因的想法麼？他不把握社會的客觀條件，不從舊社會裏去把握新社會的因素，而向人類的理性求援助，這不是空中樓閣的幻想麼？聖西門，傅利葉與歐文等人之所以爲烏托邦主義者，是因爲他們的時代，資本主義生產尚在幼稚時期，所以，他們在規定自己新建設的計劃以後不得不向理性求援助，可是，在現在，在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一百多年以後的現在，這一位摩登的奇僻而善於諷刺的「天才」，仍沒有越過烏托邦主義者的道路，這不是一個深刻而有味的諷刺麼？

從亞當斯密一直到衛勃命，都是抽象地去把握人性，把人性從歷史的社會的條件分割出來，使它抽象化爲絕對的概念，並且從這種抽象的人性概念出發去研究經濟學的。正如恩格斯批評費爾巴哈的道德論一樣，它「可以適用於一切時代，適用於一切民族，適用於一切狀態，唯其如此，它在任何地方任何時代，都是不適用的。」在我們看來，人性並不是超時代超人羣的東西，它是歷史的社會的產物，隨着歷史社會之發展而變化而發展的。馬克斯說得好：「人的本質並不是內在個別的個人之中的抽象物。人的本質，在他的現實界中，是社會的關係之總體」（費爾巴哈論綱）。布爾喬亞的經濟

思想，特別是古典學派以後的經濟思想，其根本的弱點之一，就是倒果爲因的從抽象的人性出發。

因爲人性論是這種抽象的概念，是可以適用於一切時代一切民族一切狀態的東西，所以人們都想利用這個法寶，都想玩弄這個法寶，以達其一定的目的了。看吧！亞當斯密的人性論不是與巴師夏的人性論不同麼？西斯蒙蒂的人性論不是與衛勃命的人性論不同麼？有的人用這個概念去理想化「正在轉變爲資產者的那種中等市民」；有的人用這個概念去掩蓋布而喬亞社會內利害的矛盾；有的人利用這個概念去理論化小有資產的幻想；有的人則利用這個概念以達到其對抗革命阻礙人類進步，維持自己統治反動目的。不容於新古典學派或美國傳統的經濟學家之衛勃命，其所以在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度，能受到統治者的歡迎，眷顧，誇獎的理由，就是在此。

在資本主義初期，亞當斯密之以人性爲研究經濟的出發點，雖然是頭腳倒置的去措理問題，但從歷史的意義說來，「這種觀念本身在那個時代却是一大進步」，到今天，如果仍從這個抽象的概念去把握問題，去研究經濟，那，分明是倒退的。因爲這種幹法，是無異在化學發達的今日，而仍欲使鍊金術復活啊！

三 爲什麼抬出人性論來呢？

用人性代替欲望的目的，仍在通過這種辦法去論證舊社會的生產關係乃是自然的永遠不變的制

度。但是「人性論」亦如「欲望」一般，仍是捉襟見肘，無濟於事的。

不過，在作用上，強調人性而否定欲望畢竟與單純以欲望作為經濟學的出發點是不同的。用人性去代替欲望的作用，是在於使經濟學超越價值論這個暗礁。儘管奧國學派的邊際效用說得如何「深刻」，如何「周到」，但是一經碰到實際問題，它是不能自圓其說的，何況，它的體系自身還有許多不能克服的矛盾呢？新古典學派拚命在調和供求雙方，仍無法補置資本主義生產的許多漏洞。於是，企圖超越價值論，企圖單純研究價格而否認價值的學說，便產生了。

承認價格而否定價值，就是承認現象而否定本質。新康德主義者放棄了康德的物自體；而這些先生們則把古典學派所建立的價值論，亦一筆勾銷了。庸俗派的經濟學者（指賽依，馬爾塞斯，西尼歐，巴師夏及約翰，穆勒等人，）只在發展亞當斯密中的庸俗的成份，但在這些人的著作中，價值這個概念，仍然存在着，（當然，他們是把它儘量庸俗化的。）到如今，這些摩登的先生們，却連價值的範疇亦不要了。這不是比庸俗派更加澈底，更為庸俗麼？照他們這種研究法，政治經濟學只能在經濟現象的表面漂浮着，只能在統計數字的面前止步。探討社會經濟的基構，探討社會經濟中人與人的關係，當然是被取消了的。

爲什麼要否定價值論呢？因爲討論到價值，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一定會使人觸及社會經濟中人與人的問題，一定會使人觸及社會中生產結構的問題。如果觸及這些問題，則實際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就

會系統地在這裏擺開陣勢了。理論上的這種戰鬥，是從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雙鐘敲起來以後就開始的。然而長期的戰鬥，在在證明各色各樣的庸俗學派，無法彌縫資本主義的破碎河山，於是迂迴的戰術便在這兒展開了。這就是迴避價值論，而同時又利用倫理去統御經濟生活。

人性論之在經濟思想中「發光」，是沒落階層在經濟思想中「色厲而內荏」的反映，是反科學的信仰主義在經濟思想中滋蔓的表現。

四 人性論在中國

最近幾年，人性論又在中國，找到它的市場了。販賣這一商品的人物，不是別的，乃是那些誠心誠意追隨希特勒的大人先生們。他們眼見得馬克斯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眼見得馬克斯列寧的政治經濟學說，一天比一天的在發展，在擴大其影響，而同時，一些相信歐美自由主義——特別是亞當斯密及李嘉圖的經濟思想的人物，亦捲入爭民主自由的巨浪中，因而，在反對馬克思主義同時又反對歐美自由主義的前提之下，煞費苦心的，把人性論，法西斯蒂的全體主義和中國儒家的一套倫理觀念，放在他們的那一個熬煎人民血肉的大鍋中，燒熱起來。打算用這種辦法，烹調一個什麼中國經濟學說的「好菜」來？！

因此，人性論到了中國，又具有一些與它在歐美時所不同的特點。這就是與儒家的倫理觀念聯系

起來；這就是與法西斯的全體主義聯系起來。

儒家學說是中國的封建統治者用去統治農民大眾的一種工具。它叫農民要安份守己，叫農民要貼服服地忍受地主和高利貸商業資本的殘酷的剝削。把這種學說來裝在那個抽象的人性論的瓶子裏邊，充分地表現中國「人性論」的封建性。

關於全體主義，後面將有專章來討論它，在這裏，我們只指出與全體主義結合的人性論，是與衛勃命的見解不同的。照衛勃命的見解推演下去，可能得到要求民主自由的結論，反之，全體主義則是重視「全體」，否認「個體」，尊重等級，反對自由平等的。把這二個東西結合在一起，所謂人性論的「人性」就會在質上起了變化了。

正如我們在上面所說，過去的人性論者都是把人性從歷史的社會的條件分割出來，而使它抽象化爲絕對概念的。這是一種倒果爲因的看法。事實上，人性是歷史的社會的產物。這種批評，我們剛才已經指出了，但對於中國的人性論，如果單單這樣去批評，那是不够的，因爲人們把它去和儒家的倫理觀念，去和法西斯的全體主義結合，所以，我們的批評，亦應從這方面着眼。

第一，如果依照過去那些人性論者的見解，不管是利己主義也好，不管是利他主義也好，總是要承認一種人性的，但是，法西斯蒂的全體主義却以絕滅人性爲最高的任務。法西斯蒂只承認「全體」，只承認等級。其所謂「全體」乃是獨佔的金融寡頭的化身，其所謂等級乃是獨占金融寡頭及其

走狗法西斯黨徒的統治而已。在這種情形之下，你不能「利己」，因為你的一切是屬於「領袖」的，你的身體就是領袖用來抵當砲火的肉彈；你更不能「利他」，除非這個「他」，指的是獨佔金融資本和法西斯頭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犧牲的無數生命，法西斯帶在各處所設立的屠場和集中營，處處證明法西斯主義的特點就是絕滅人性。把人性論去與絕滅人性的法西斯全體主義結合，難道不是一個不能調和的矛盾麼？難道不是把人性論否定得乾乾淨淨了麼？這一點，證明中國的大人先生們要用人性論去掩蓋其吃人的獍狉面目，是枉費心機徒勞無功的。

第二、用儒家的倫理觀念去「充實」的人性論，乃是封建地主的「人性」。這種封建的「人性論」，如果從其「最高尚」（？）的一點來說，只不外叫地主不要殺雞取蛋，不要竭澤而漁而已。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封建剝削得以維持下去。可是，那些不勞而獲的寄生地主，是不會聽這些活的，因為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他們非無限地對農民剝削不可。在另一方面，人性論叫他們忍受沉重的殘酷的地租與高利貸的剝削，更不會得到廣大的饑寒交迫的農民的同意。現實的體驗，生活的需要，必然要從減租減息走到耕者有其田的大道。這樣的行動，如果從封建式的人性論看來，那是大逆不道的。故無論從那一點，地主的貪婪無厭和農民的「大逆不道」，都會把這個人性論否定得乾乾淨淨！

這種封建的法西斯的人性論，被客觀的事實所否定，亦被它自己的內在矛盾所否定。統治階級到了快沒落的時候，不管他怎樣說教，不管他說得怎樣頭頭是道，但沒法掩蓋其吃人的獍狉面目，更沒

法挽救它的沒落的運命。希特拉和慕索里尼的覆沒，就是證明。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一日初稿；一九四六年五月卅一日補充最後一段

全體主義是什麼東西？

一 全體主義代表了誰？

全體主義的經濟思想之流入中國，已經有十餘年的歷史。如果從其與自由主義派及科學的社會主義派對立的局面而言，顯然有「命運多舛」之感。所以，早些年，「經濟學季刊」上雖曾發表過替這個主義吹噓的論文；中國經濟學社中雖有少數人士寫過推崇這個主義的著作；而其影響仍是可憐得很。但到最近，這個學說似又有抬頭之勢。在墨索里尼已經跨台，希特勒將進墳墓的時候，茂勒（Adam Muller）的幽靈却遊歷到我們這個古國來；史班（Uthman Spain）的胡調亦被人們當作「金科玉律」了。這是不可不加法意的。

經濟思想中的全體主義是什麼東西呢？它是代表了誰的利益呢？它是為誰而辛苦地在經濟理論關爭中爭取地盤的呢？

每一種經濟理論都是有其社會背景與階級本質的，自從科學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敲起了喪鐘之後，「成爲問題的，不是真理與非真理的問題，祇是於資本有益抑有害，便利抑不便利，違背警章抑不違背警章的問題。超利害的研究沒有了，代替的東西是領津貼的論難攻擊；真正的科學考察沒有

了，代替的東西是辯護者的歪曲的良心和邪惡的意圖」（資本論著者第二版跋）。所以，我們在研究經濟思想的時候，是不能不提高警覺性，不能不「謹防扒手」的。

從十九世紀末葉，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為獨占壟斷。獨占的產業資本與獨占的銀行資本，結合起來，構成爲金融資本了。銀行與工業的聯系，密切起來，鞏固起來了。在這裏，資本家都變成了股票、債券、公債及其他有價證券的持有人，生產過程的管理，他們是沒有參加的，負責企業管理的人，却是那些被僱傭的技術人員。於是，資本家便變成爲完全空閒專靠「剪股票」去過活的寄生階層了。不但如此，資本的輸出，「更加强了寄生階級這種完全脫離生產的情形，更使寄生性的印章蓋滿了那些靠榨取海外國家和殖民地而生活的整個國家。」以個人的消費做出發點的邊際效用說，就是代表這些養尊處優脫離生產的寄生階層的，就是代表着資本主義沒落期的這些金融寡頭的。不過，與國學派只是反映着金融資本的寄生性而已，還未能充分的反映它的壟斷性。

獨占壟斷加強了資本主義的一切基本矛盾，革命的危機是日益深入的。到了這個時候，統治者的改良和欺騙的辦法是行不通了，恐怖的專政——法西斯主義，便成爲新的支配方式。歷史所告訴我們的，正是如此。最初的法西斯組織，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在第一次革命與戰爭的浪潮中，在那些資產階級統治直接受到無產階級革命威脅的國家內製造出來的。爲了打擊日益增長的革命勢力，統治者需要恐怖的專政去摧殘工農革命運動。一九二〇——二二年在意大利，一九二五——二六年在波蘭，以

及二十年代以後之在德國，法西斯之所以跳樑，就是資產階級處於這樣尖銳的時期。故「法西斯主義的特徵，就是社會的煽惑、賄賂、和積極的白色恐怖之兼施並用，同時在對外政策方面，採取極端帝國主義的侵略。」適應着這些特徵，沒落的社會階層便在社會學經濟學中，製造出什麼全體主義出來了。

經濟思想中的全體主義，重視「全體」不承認有「個體」，尊重等級，反對自由平等。這種「個體」服從「全體」及等級不可侵犯的說法，不是希特勒的極權國家的「理論根據」麼？不是希特勒黨徒摧殘工農大眾的有利的理論武器麼？如果奧國學派的經濟理論是在發揚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的一面，那末，全體主義的經濟思想，則分明是在發揚金融資本的獨占性，是在為法西斯專政的社會壓迫與民族侵略找根據，想辦法的。全體主義是法西斯蒂在經濟思想方面的代言人。

二 全體主義的思想淵源

全體主義的「學說」概念，是維也納大學教授史班（Othmar Spann）所創立的。他的學說，不但對於德國資產階級的經濟思想有很大的影響，「且足以左右希特勒上台前的青年的哲學思想」；有人甚至寫了「為史班而奮鬥」的書來，這亦就可以看出這一位反自由主義反馬克斯主義的健將，是怎樣的不可一世了。

其實，全體主義並非史班所獨創。史班的大部份學說，多得之於亞當茂勒（Adam Müller），而

亞當茂勒經濟學說的根本觀念，則得之於哲學家費西特（Fichte）。因此，欲明白史班的思想根源，不可不追溯到費西特和茂勒。

費西特的學說是來自康德的，他把康德的二元論轉化為主觀的念觀論，在這裏，康德學說中唯物論的要素——「物自體」被取消了。他的根本命題是「自我即是一切」，「自我」創造了形成了與自我對立的一切東西（非我），自我是創造一切的帶着普遍思維性格的東西，他把客觀世界消解於自我之中了，因之，他把實踐還元作思維活動，把發展還元作理論構成的連鎖發展。和發展的原理有密接關係的，是相互關係的原理。依費西特的理解，「一切的部份，都是因為有了全體才能作為部份而存在」。這種部份與全體的關係，這種主觀觀念論的觀點，就是茂勒與史班的全體主義的基石。

說到茂勒，那是史班的思想的直接泉源。史班自己曾經這麼說：「常常有人對我說，你只講茂勒，那有什麼意義？這真是神經病！這我不能承認，我只向諸君說一句，你們追求那偉大的精神，他對那時代的寵兒，對那奠立時代思考的個人主義根本思想加以攻擊，而以另一有機的一貫思想與之對立，你只能找到一個人，這便是茂勒」。史班對於茂勒，可謂五體投地的在崇拜了。畢竟茂勒是什麼一個人呢？他的思想是什麼呢？

茂勒是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奧國一個反動貴族，是專制魔王梅特涅（Metternich）的幫兇，是民主自由的死敵。這一位出自普魯士的貴族之家的官僚，其一生最大的努力，是想把歐洲拖回到法國大

革命以前的狀況，他深信封建制度及封建社會的階級與關係，其中包括天主教會，是最完善的組織，並且認當時的改革運動勢必推翻國家繁盛及幸福的基礎。他對於這一反動運動的「貢獻」，就是在於攻擊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的思想。

亞當斯密從個人出發而後推及國家，從經濟觀點而言，他以為國家祇是無數個人的集合體而已；反之，茂勒則從國家出發，以為構成國家的個人，除了看做全體的部份之外，即使從他們的經濟關係及利益去觀察，亦不能了解，他說：「人不能立在國家的範圍之外，」他解釋國家為「人類活動的總和，是『他們結合起來的更大的全體。』」很顯然，這是費西特的「一切部份都因有了全體才能作為部份而存在」的再版，但是費西特與密勒之間是不能劃一等號的，費西特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熱烈信徒，他的哲學吹動着法國革命的思想，他反對封建所有權封建國家與身份特權等，但茂勒則以這種全體主義去鼓吹其封建復辟的胡調，他認國家及民族包括過去，將來及現在；並認時間上的連結有極大的經濟意義。他以為：不承認這一點就不能了解國家的信用，私有財產的繼承，大小產業相對價值的恰當估價，以及貴族對於國民經濟的意義，而他認貴族是連絡現在及過去的主要手段。說了大半天，茂勒的真面目在這裏顯露出來了。

茂勒又批駁斯密過重物質，其謬誤無異於重商主義者之過重貴金屬。他以為道德及精神是更高的慾望，這是超過物質享樂的。因之，他認為：「農人耕種，第一應為上帝及愛好工作而勞動，其次為

總生產，最後才想到淨生產，「又認地主之「管理地產爲一種任務，一椽公共委托的任務；」「租稅爲寄存在國家裏面雖無形而必要的精神資本的利息」。好一個煞費苦心的茂勒，真是把一個黑暗沉滯的封建社會，描寫成爲一幅美麗的圖畫了。農民之耕田是爲了上帝；地主之掌握土地則是「公共委托的任務」，封建制度是「千秋萬世」最合理的社會了？！

除了茂勒之外，李士特對於史班亦有不少影響，李士特的經濟思想亦是與古典學派對立的。從其對於古典學派的批評上，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特徵。第一，他認古典學派爲空幻的世界主義，不理解國家或民族爲何物，第二是「死的唯物主義」，祇顧到物品的交換價值，毫不顧及道德；第三是無組織的個人主義，不說明如何使一個貧窮的弱國躋於富強之域。由此可見；李士特的經濟思想是國家主義的，是觀念論的，是主張干涉政策的，而這幾點，又是史班的全體主義的重要原素。

史班是把全體主義加以系統化的第一人。茂勒謂：「個人爲總體的分予，而社會非爲個人的總合，社會乃爲一有機體之物，其有機體之發生，乃在各個人之互相反應」。依據這種說法，史班更擴大而提出這種主張：「社會並不是各個絕對獨立的個人的集合體，也不是各個已經完成定型的分子的聯盟。牠是一個獨特的精神個體，而且是個人生命的必需前提，因此它的結構必然全是倫理的，而不僅僅是功利的。社會是各個人創造精神的交錯，各人必在這一種組合形式之下，方可完成其生活，各個人已不能成爲自給而獨立的個體，各個人生活能力的泉源，乃在彼此間精神的交流，乃在全體之

中，普遍之中與集體之中」。

其實，單單從費西特及茂勒，還是不能了解史班的全體主義之「時代性」的。要了解他的「時代性」，就必須把它與新黑格爾學派聯系起來。新黑格爾主義是現代法西斯主義的哲學。這些「理論家」利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尤其是「法權哲學」，澈底地拋棄黑格爾唯心辯證法中一切有價值的原素，而抓住並發揚了他們學說中一切死去的、反動的、神祕的成分、絕對觀念這個偶像；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他們歌頌着對法西斯國家的崇拜觀念，他們認為這種國家體現着絕對的，具體的一般性，每個人都應服從這種一般性，與這種一般性融合一致；他們號召人們須在狂暴的法西斯獨裁國家的「絕對價值」底祭壇前面，虔誠犧牲。史班先生就是這一個反理逆流中的一名健將。他的「全體」的觀念，就是社會學經濟學中，新黑格爾主義的擴展。他使用「全體」這個概念，建立了一個符合於法西斯國家機構的社會經濟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內在的矛盾是沒有的。他的學說與那個做過意大利法西斯教育部長的秦梯爾（G. Gentile）的見解，有似桴鼓相應。因此，離開新黑格爾主義而談史班的全體主義，是不可思議的。

三 史班的方法論

現在，讓我們先從方法論說起吧！

從古典學派一直到奧國學派，在方法論上，他們有一個共通之處，這就是以孤立的個人作為出發點。用這種孤立的離羣索居的個人作為研究的出發點，是不能符合實際的。因為人不僅是一種社會的動物，而且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單獨化的動物。『在社會以外的單獨的個人的生產——這是在動態中已經具有諸種社會力的文明人偶然被飄到絕境時所能有的一件意外事——就如言語之不待有共同居住共同說話的人一樣，是同等不通的』。正相反，人們的生活是社會的。馬克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中很明白的說：

『在社會中生產着的個人們——因而個人們之社會地規定了的生產，自然是出發的基點』。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中，更明白的指出：

『人們在其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中，彼此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是適合於他們的物質生產力底一定的發展階段的。』

這就是說：客觀存在的社會，是自發地，不依賴於人們的意志而發生的；從個人對社會而言，後者是先行於前者的。『因為人們不能自由選定這種或那種生產方式，這是因為當每一新羣人開始生活時，他們是已遇着已經現成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即前輩人所工作之結果，因此，這新羣人在最初一個時候，是應該接受他們在生產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現成東西，並應當遷就於這些東西，以便取得生產物質資料的可能。』（聯共黨史第一五二頁。）『所以就在經濟學之理論的方法上，主體——即社

會，總常要浮在念頭上認定爲前提。」

如果把社會的生產作爲研究的出發點，那末，史班的全體主義的方法論不是不錯的嗎？不，本質上是不同的。史班誠然說過：『經濟底整個關聯的認識，開始就應該不從相互結合的個體出發，而必須從全體出發。』但這種方法是抽象的，是從主觀的觀念出發的。因爲人們在生產物品及交換物品時所處的條件，在各個國家是不相同的，而同一國家亦跟着時代之不同而有異的。從野蠻人的弓箭石斧和稀有的交換關係等，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電氣化的生產，真不知隔了多少距離。所以，『政治經濟學就其自身的本質講來，是一種歷史的科學。他要研究歷史的，即不絕變遷的材料；他首先考察生產和交換發展上每一個階段的特殊法則，祇在經過這種考察之後，他纔能够定出很少的最普通的可以用於一般生產和交換的那種法則。』但是史班的所謂『社會』，乃是『一個獨特的精神個體。』這種獨特的精神個體，乃是抽象的東西，乃是主觀的，純粹先驗論的獨斷的產物。列寧在『誰是人民之友』中說：『當你還沒有把其中任何一個社會形態研究好，甚至於還未能確定這個概念，甚至於還未能着手來認真按事實研究，以客觀態度來分析任何一種社會關係的時候，那末，試問你能怎樣得到關於一般社會和一般進步的概念呢？』（見『誰是人民之友』中文本二十一頁）列寧在這裏批判的是孔德，斯賓塞之流的社會學和民粹派的主觀社會學，我想引來批評全體主義的方法論亦是很適當的。

其實，所謂全體主義的方法論，事實上並不是史班的發明。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早就以有機的整體，如人口、國民、國家、聯邦等等作為研究的出發點了。這是「一個總體之混沌的觀念，」但他們還有可取之處，因為他們是從客觀存在出發的，而史班却以他自己主觀所杜撰的所謂「獨特的精神個體」出發，這不是比十七世紀的經濟學家退了好幾步麼？史班畢竟是一個死硬派，他公開的咀咒唯物論，說「唯物論這個字是一個非德國字，而且不該是德國字。」可惜存在於史班的腦子以外的德國，不但有唯物論這個字，而且有唯物論的思想，千千萬萬的德國人民縱在暴力壓迫之下，却深刻地在相信唯物論。他自稱：「在形而上學的範圍內是，而且願意是，形而上學者，但在經濟領域則不是形而上學者」。史班先生，你實在太客氣了，爲什麼「在經濟的領域不是形而上學者」呢？難道你之以你自己所製造的「獨特的精神個體」爲出發點，不是玄而又玄的形而上學麼？用這種非歷史的抽象的主觀觀念作為研究的出發點，還不是與古典學派的離羣索居的漁夫和獵人，與奧國學派的徬徨於沙漠中的旅客一樣的乾燥無味，一樣的不合於客觀的事實嗎？我們曉得：「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決定着一般社會生活的、政治生活的、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反而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要研究社會經濟，自不得不從那些存在於我們之外的，構成社會底經濟結構的諸生產關係去着手；精神生活乃是社會的上層建築，固然這些上層建築可以影響經濟基礎，但是，前者乃是後者的反映，前者是第二性的現象而後者倒爲第一性的現象。故社會底精神

生活藉以形成的來源，不應從觀念，理論或觀點本身去找尋，而應從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中，社會存在中去找尋。史班的錯誤，就在於「本末倒置」的從「精神」出發，從虛無飄渺的天空中去建立社會。

與史班的主觀觀念論打成一片的，是他的否認客觀事物的矛盾性。他以爲全體之內沒有矛盾；個體必定融解於全體之中。這種見解與意大利的秦梯爾是一個鼻孔出氣的。否定客觀事物的矛盾性；除了乞靈於觀念論之外，他們是沒法說明事物之發展的。至於他們之所以如此，其目的不外是：又去崇拜那個擦去社會矛盾的什麼「全體」而已。

此外，據史班自稱，他是排斥機械因果律的，至於全體性的方法，則爲「實質的分析」。史班先生真會講漂亮話，機械的因果律是應該反對，應該排斥的，不過，史班之反對機械的因果性不是因爲機械論者否認物質運動的各種特殊形態中所固有的規律性的特殊性，而是因爲因果性乃是客觀世界的聯系中所實在固有之點，因爲「馬克斯的資本集中法則，照這個集中法則，共產主義必然的要到來」（見史班一九二九年在德國經濟學者國家協會上的演講「經濟學之危機」）。讀者們，這一句話還不夠明白嗎？他是爲了恐怕工錢勞動制度，爲了恐怕這個剝削剩餘價值的生產關係之沒落而反對因果性的。可惜的是世界的客觀性到底是不依存於史班先生的獨特的精神個體而發展着，最反動的金融寡頭是不能千秋萬世的維持下去的。那末，「實質的分析」到底又是怎樣一回事呢？分析在科學中盡着極

大的作用，它使我們能夠將世界的多樣性分解為個別的部份現象，而蓄積認識材料以至把握世界，由分析所獲的一切認識，是不能離開全體的，綜合的關係，因為離開全體，則分析就會變成死的不動的抽象了。全體主義之所謂實質的分析，表面上，看來很漂亮，但是，它的所謂「實質」完全是假的。因為史班是以「概念手段」去「達到實際」的。把經過他所製造的概念去達到實際，則這種實際不是被他加工加料地改裝了一番嗎？用這種辦法可達到的實際，還能說是「實質的分析」嗎？

史班的全體主義的方法論，乃是獨斷的純粹先驗論，他歪曲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否認了客觀事物的矛盾性，他雖然表面上反對機械的因果律，但其所謂「實際的分析」，不外是在「分析」的招牌之下，掛羊頭賣狗肉的在私販其直觀的把戲而已。

四 什麼是史班的「社會」

史班的所謂「社會」——即是他的所謂「全體」，乃是一個抽象的東西，但按其實際而言，不外是指法西斯專政的國家吧了。捷克一位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佛蘭芒克（Frantik Munk）對於這個問題作爲是的看法。他說：「『社會』這兩個字的本身是沒有意義的。這兩個字不過用以說明某一分類的某一範疇，可是並成有說明它的內容。假使你把「社會」兩字換成「階級」，那就是共產主義，假使你把「社會」兩字換成「羅馬帝國」，那就是法西斯帝國主義，假使你把它換成「民族」，那就是希

特勒的國社主義」(見佛蘭芒克的「武力經濟學」)。芒克氏這段話，包含了一個很大的誤解錯誤。這就是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等量齊觀。科學的社會主義對於社會的看法與法西斯學者的史班的社會觀，毫沒相同之處。史班的全體主義之所謂「社會」是「一個獨特的精神個體」，而馬克斯主義則以為社會是歷史上特定的生產關係的體系或生產關係之總和。為了生活，人們必須進行物質生產。在生產過程中，人們必須參加一定的離開他們的意志而獨立的生產關係。一定的生產關係以一定的生產力為基礎；而生產關係的總和則為社會的經濟構造。在這個經濟基礎上，建立起國家、法律、及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來。人類從過去到現在，已經歷了五種社會，即是原始共產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各個歷史時代各有其特殊的社會形態和特殊的生產關係體系，每個特定的社會，具它自身的發生和機能，向較高的形態轉移，向其他社會有機體轉移的特殊法則。馬克斯主義的社會觀，是緊緊地握住它的歷史性的，像這樣，怎能把它與史班的觀念的抽象的一般的社會觀，混為一談呢？馬克斯主義者努力的目標是在於消滅社會中的階級，消滅社會中人對人的剝削制度，而法西斯蒂則以最反動的金融寡頭的獨占利益為圭臬的，是以沒落期的獨占資本的野蠻的剝削和寄生腐化的生活為圭臬的，像這樣，又怎能把它與馬克斯的共產主義與法西斯蒂混為一談呢？

不過。佛蘭芒克氏對於全體主義的「社會」的本質，肯定為法西斯主義的統治，那是不錯的。如果只是說：「假使你把「社會」兩字換成「羅馬帝國」，那就是法西斯帝國主義；假使你把它換成

「民族」，那就是希特勒的國社主義」，那實在是中肯之談。他在描寫全體主義的國家的時候，亦寫得頗爲生動。他說：

「祇有領袖們，新的貴族們，和超人們，才可以運用他們的思想；而且即連他們，也要聽命於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的決定。其餘都不過是被動的材料，太多的一羣（The Common），新的農奴，其唯一的優越感，是在他們之下，還有臣服而劣等的民族奴隸。他們也許不過是齒輪上的一個小齒，但是他們依舊屬於「主族」。遠在他們的下面，在永遠的薄暮中，還有千百萬的白奴，正在爲他們的偉大而流着血汗。世界又回復到幾世紀以前的狀態，在那忙着征服世界的凱撒們的鐵蹄之下，過着屈服與貧困的生活。」（見武力經濟學）

佛蘭芒克的筆法，到底是素描的，我們讀了，只是得到一個輪廓而已，他還沒有把德國法西斯的眞面目寫出來，讓我們看一看法西斯專政下的社會，到底是誰在飛黃騰達吧！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末，德國百萬以上的富翁，增加了一千二百六十名，幾百萬的富翁增加了一百八十名。西特奈大學教授羅伯茲在他研究納粹統治的一書中寫道：「希特勒沒有絲毫侵犯德國大資本家的權力，事實上，希特勒四年當政最顯著的特徵是德國重工業裏崛起了一些超等的托辣斯」（S.E. 羅伯茲：「希特勒造起來的屋子」一九三七出版）。在德國托辣斯大富翁的歡天喜地之中，法西斯領袖層里亦生出不少的新財閥。如赫曼——戈林公司就是一例。法西斯政府在這個公司裏投入幾百萬資本。戈林原來就

是一個富豪，但這個公司却爲戈林的整個家庭開闢了一條參加最高財閥集團的道路。他的親屬布拉賽特，在建築工廠中發了大財，他的兄弟赫伯特戈林就作了四個大工廠的董事。就是那位國社黨發言人戈培爾也沒有吃虧，雖然他是客氣了一點沒有公開出來作金融交易，但他的財產管理人——根室·克旺特，無時無刻不在利用戈培爾的優越地位去做其賺錢的生意。價值數百萬的一所漂亮的別墅，他却以三十萬馬克就買到手了。如果從德國大資本家的利潤來說，單以希特勒最初當政四年而論，擁有二十一萬萬馬克的資本的五十家大公司的利潤，就從一九三四年的一萬二千四百萬馬克，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一萬八千八百萬馬克，同期間的分紅，從八千五百萬馬克增加至一萬三千二百萬馬克了。戰爭加速了產業股票價格指數的增漲過程，從一九四〇年四月至一九四一年四月的一年間，德國產業股票指數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克虜伯的利潤從一九三九年的三萬九千五百萬馬克增加到一九四〇年的四萬二千一百萬馬克；德國鋼鐵托辣斯的利潤從一九三九年的二萬二千二百萬馬克增加至一九四〇年二萬六千萬馬克。這就是法西斯蒂統治下的社會「新秩序」的眞面目。史班之所謂「社會」是「一個獨特的精神個體」或「各個人創造精神的交錯組合」，與墨索里尼的「國家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存在」不是一色一樣的嗎？與希特勒的國家「是一個公社性的組織，有着上下一貫的統一性和協調無間的情操，」不是互爲表裏嗎？史班這樣的扮着理論的面孔，唱着學理的濫調，披着學者的外衣的目的，無非是在盡其爲法西斯蒂作吠吧狗的作用，無非是在以「精神」的夢囈去掩蓋那一批強盜

貴族，軍閥，金融寡頭大托辣斯老闆和大地主的吸血的榨取而已。

可惜的是，鐵的事實是任何花言巧語所掩飾不了的。試問那些強盜貴族和軍閥的盡情掠奪，「全是倫理」的嗎？試問金融寡頭，大托辣斯老闆和大地主的吸血榨取「全是倫理」的嗎？試問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的法西斯的野蠻統治，廣大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的生活，是「彼此之間精神的交流」嗎？試問把獨佔利益的權力與國家混合在一起，高高地鎮壓住一羣奴隸人民的這樣一種「社會」，是「各個人創造精神的交錯組合」嗎？法西斯蒂是善於在血腥的恐怖之外，同時以宣傳教育的詭計作為補助手段的。史班的全體主義就是盡着這種麻醉欺騙的作用的，但法西斯蒂的野蠻黑暗和血腥的統治，揭露了史班的胡說的本質；廣大的人民大眾，在生活中的體驗，更明白的認清了史班之所謂社會是「一個獨特的精神個體」或倫理的結構底本質。

五 經濟是「全體」裏的肢體嗎？

史班以為「全體是人類的社會」，而經濟不過是「全體」裏邊的肢體而已。他很乾脆的說：「全體主義的國民經濟學說之第一個一貫思想，即經濟這一全體，係當作更高全體之社會的一部份。」它（指經濟）是達到目的之手段的體系。依照史班的說法，經濟是與宗教、科學、藝術完全不同的，「宗教的、科學的、藝術的生活，其本身即是目的，即是價值，即如生命的感覺，如我們於飲食睡眠

之間所覺察的，其本身也即是生活的感覺目的，它本身有他的基礎。只有經濟是例外，經濟本身沒有目的，而是達到目的的手段體系。經濟為生活的感覺而活動，因此，他應給飲食睡眠等，而亦應給其他的精神目的。假如我要建築一所教堂，我將如建築一所住宅似的去經理，住宅所以供睡眠禦風雨，即為生活的感覺（目的）而建築的；教堂乃為宗教的感覺而建築的，倘若我們從心理方面來講，可以說，如教堂、戲院、戲台佈景等，其目的在求滿足宗教的藝術的需要（感覺），其需要本身即當作目的而實現。」

對於史班的這種提法，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三點來討論，第一、「全體是人類的社會」底意義是什麼？第二、宗教、科學與藝術的生活，「其本身即是目的」嗎？第三、經濟在社會結構中站了什麼地位？

關於第一點，依史班之意，問題的中心是社會的內容及其目的，他解釋道：「社會之整體純然是由這樣的內容產生出來的，內容本身即是它的目的」。很明白，以內容為目的，不外是肯定了金融寡頭與大地主的剝削制度，不外是以這種剝削制度之維持，作為「社會」的目的吧了，其次，「以內容為目的」即是否認社會歷史有客觀法則之另一種說法。這是史班否認因果律的必然結論。我們曉得，人類底歷史，並不是什亂無章的偶然事件的堆積。亦不是如意地以一定內容作為目的而進行的。「歷史上所發生的事象，從其全體看來，似乎亦一樣為偶然所支配，然而表面上固屬偶然也發生作用，可

是這情況上，偶然又時時為潛在於牠內部的法則所支配」（恩格思：費爾巴哈論。）歷史的過程是有內在的規律性的，不過，這是不能「以內容為目的」。各個社會各有其發生發展並向較高的形態轉移的特殊法則。這些法則是不能以人的主觀意志去支配的。如果「社會」以內容為目的，則奴隸主人可以以把奴隸社會維持下去，封建領主可以以把封建社會維持下去了，然而，這些社會制度却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跡。這不是證明以內容為目的是一句精神的噱語嗎？

其次，讓我們來談一談宗教科學與藝術的目的問題，史班以建築教堂為例去說明宗教是目的而經營建築的經濟行為為手段。如果對於經濟的活動，是用這種皮相的眼視去把握，或許可以這樣說吧！可惜事情並不如是簡單。史班自稱是全體主義者，要用「全體的方法」（？）去作實際的分析，在這個地方，明明是從片面去了解經濟，明明是從表面去了解經濟的，這不是一個諷刺麼？如果不是故意閉着眼睛的話，要了解什麼是經濟，就必須從物質生產中特定的生產方式去着眼。然而史班却用市儈的眼光去看待經濟了。現在讓我們把問題追究下去吧！建築教堂的目的是什麼呢？史班說是「爲求滿足宗教的需要」。爲什麼要滿足宗教的需要呢？史班就不肯在地上去追求原因了。然而，在我們看來，這是很明白的事。自社會分裂爲階級之後，宗教就成爲社會鬥爭的強有力的武器，支配階級利用宗教麻醉被統治者的意識，而使他們的希望，期待和意志，從不幸的地上生活，轉寄於天國的幸福生活，藉以削弱被統治者對於地上的鬥爭的意志，這種地上的鬥爭，是以社會的物質生產爲根源的。從

此看來，豈不是宗教以經濟利益爲目的麼？史班的見解難道不是本末倒置麼？至於科學，亦是不能把它的本身作目的的。看看歷史的事實吧，「伴着市民階級的興起，一步一步地，科學的勃興，也展開起來了。天文學、機械學、物理學、解剖學、生理學又重行研究起來了。市民階級爲得要發展他們的工業生產，就需要一種研究自然物體的性質與自然力的作用方式的科學」（從空想到科學的社會主義導言）。近代科學之發展，既是由於市民階級要發展其工業生產而來，難道這不是爲了經濟的目的麼？談到藝術，亦何嘗不如此？藝術的發展與其他意識形態一樣，總是決定於某一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而且它又是這一社會的統治階級把自己的意識形態普及到被統治階級去的有力工具。看事實吧，沒落的「布爾喬亞及貴族遺孽正在造作所謂「人生藝術」以寄生階級憐憫平民的溫情政策緩和革命情緒；或者，提倡所謂「純藝術」，表現他們對城市文明的苦悶而逃心自然，以促進反動而抑制前進的精神；或者，像那種美國式的教訓公德主義及利祿色慾主義的塵俗藝術，表現些個人鑽營或幸運奇遇的富貴夢，以誘惑羣衆，使之墮落而不鬥爭」（瞿秋白）。在這種事實的面前，史班先生之所謂藝術的「本身就是目的」，難道不又是精神的囁語麼？藝術之有階級性是昭然若揭的；藝術之歸根於某一社會的生產方式是昭然若揭的。

談論了宗教科學與藝術之後，我們便可迎刃而解地來解決經濟在社會中站什麼地位的問題了。不要說法律政治等要受經濟所決定，就是宗教科學與藝術等亦無一不以經濟爲依歸。那末，經濟在社會中的

地位不是很明白的麼？恩格斯普通地把這個問題指點出來。他說：

「人類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但要在既存的並制約他們的環境之中，並且要以眼前存有的事實的諸關係為基礎，在這些關係裏面，經濟的關係，固屬也能為其他政治的關係及觀念形態的關係所影響，但結局，經濟的關係，却是決定的關係，並成為領導到理解之道的一貫的線索」（轉錄自「費爾巴哈論」）。

經濟關係在社會中既然是決定的關係，歷史上「人羣」的活動，既然以這一關係之利害為內容，那末，史班之所謂「經濟本身沒有目的」，或「經濟當作更高全體的一部份」，不是「頭在下脚朝天」本末倒置的說法麼？他之所謂「文化生活是更高的全體」，不是這種說法的進一步的見解麼？其實史班這種見解不外是更為「精練」的文化社會學而已。在社會鬥爭的大舞台上，為了確保並強化其野蠻的剝削與統治，沒落的金融寡頭的御用學者就提出「文化」這件法寶來，他們更把自己的文化當作文化本身而加以神聖化。史班的社會經濟學說，就是這裏一個支流。他之所以一口咬定「經濟本身沒有目的」和「文化是更高的全體」，無非在於以文化的畫圖去遮蔽人民的眼睛，去使人民忽視活生生的經濟關係，去削弱人民的反法西斯的鬥爭意志與情緒而已。

六 「達到目的之手段的結構」(?)

「經濟是一個達到目的之手段底結構」，這一句話，在史班的學說中，還包含有另一種意義。他以為「這結構中含有普通學說所稱的生產，也有如董克邁的調整或管理，我以為其所以有價值，是兩者俱包含於這結構之中，而且包含於一個統一的高級概念之中。如果對於經濟只有一方面論到「管理」，或他方面論到生產，或此外說到交換，即是完全不夠的，而且不能產生統一的系統概念。」

「機構底概念，其中統一地包含了全體和肢體底概念，包括了一切的活動。」照他的意見，經濟是一個有組織的機構，「在「調整」，「管理」與「生產」之間，不能含有矛盾。」

爲了證明這種主張，他更進一步的說：「多數的個人不能產生機構，機構非成就于個人，而先行的條件乃是機構。個人係組織於機構之中，例如工人，如果他決定他將做金屬工人，或農業工人或其他的類似的工人，然後才考慮到：他應試進那一種活動部門。企業家則是這樣，如果他想：「我用我的錢建設一個皮革廠還是製鞋廠？」然後他必須加入皮革部門或製鞋部門。交易所的經紀人將這樣，如果他考慮：「我該往上漲或下落方面投機？我該將這股票買進那股票賣出呢？」他將加進於此或彼的資本投資，並投資所辦的經營部門。經濟組織之吸收個人，係永遠存在着。經濟家現在這樣做，百年前並在石器時代也這樣做，因爲他發現永遠有一個經濟組織行爲，他必須組織於其中！因此，我們不知道個人的私利，而只知道組織的理由。」

「鐵賦休哉！在石器時代，「經濟家」就在幹着資本主義時代的活動，從古到今，經濟機構都是有條不紊的體系！史班先生夢想着金融寡頭的托辣斯組織吞沒了

一切，情不自禁的竟把一切過去的社會經濟，都托辣斯化了。這難道不是太輕狂了麼？這難道不是熱狂沖昏了頭腦麼？冷靜一點！看看事實吧！

我們可以把史班先生的「石器時代的「經濟家」與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投機家相提並論的。近於無常識的非歷史觀的糊塗說法，置而不談，但對於他之強調經濟之組織性一點，不可以不論。在人類歷史上，在自足經濟存在的地方，氏族社會中的公社，如偏僻在孤村中的「家長式的產業」，就是例子，但在商品生產經濟中，從整個社會而言，組織性是越來越薄弱的。在商品經濟之中，每個生產者誠然是整個社會勞動的一部份，在這裏，每個紡紗者、織布者、掘煤者或司機者的工作誠然包含在社會生產的整個體系之中，而構成整個體系中的一部份，但是，在商品生產中，每個個別工作是獨立的，各個個別生產者的勞動，並沒有作有組織的聯系起來，正正相反，這些個別工作者底勞動是零碎的，是散漫的，這就是商品生產的矛盾，亦就是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根源。換句話說，在商品生產之中，生產者是喪失了統制自己社會關係的能力的。『每個人用其偶然所能支配的生產手段，為自己而生產，並用來滿足自己特殊的需要。誰也不知道，他所生產的那種產品，要有多少數量供給於市上，不知道他能夠找到多少數量的消費者；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究竟是否為人所需要，不知道他是否能夠抵償成本，不知道，一般的是否能夠賣去他的產品。』這種無政府狀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更明白的呈現出來，而且採取了更擴大的範圍。『可是，資本主義在社會生產中用來加重

這種無政府狀態的工具，却是無政府狀態的反面，即在每一個別企業中的社會組織化的加強。『個別工廠中生產的組織化與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對立的，但同時前者又加深了後者的程度。然而史班先生却在強調經濟活動中的組織性，這不是白晝見鬼嗎？所謂「實際的分析」，「實際」是在那裏呢？

史班先生對於「組織」是太有興趣了，或許他是把托辣斯、新狄卡或卡德爾所統治的獨佔資本作為根據吧，然而，不幸得很，資本集中或獨佔資本所統治的社會，不但未能免於無政府狀態，反而加深了這種狀態。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這麼說：

「卡德爾可以消滅危機，這完全是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竭盡全力來替資本主義粉飾的一種論調。其實恰恰相反，在某幾個工業部門中形成起來的壟斷，反使一切資本主義所特有的紛亂現象，更加緊張與劇烈起來；工業與農業發展之不相適應，是一般資本主義底特點，而這種不適應性現在更其增進了。最卡德爾化的工業（即所謂重工業，尤其是煤鐵工業）之特權的地位，使其各個工業的部門，發生一種被約特爾（Jodel）（他是那一本最好的論「德國各大銀行與工業的關係的書底作者」所認為「更其厲害地缺乏計劃性的現象」（列寧選集中譯本第八卷三八頁）。談到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回頭來看史班先生的嚴密而有組織的經濟機構的堅實性了。他說「機構的概念，其中統一地包括了全體和肢體的概念，包括了一切的活動，其中並特別包括了交換。」但

實際上，資本主義的生產，却流行着無政府狀態，獨佔資本的統治下，更是亂七八糟。「全體和肢體的概念」，只是存在於史班先生的「心靈」之中而已。如果要追求動機，則史班先生的這種說教，一方面是在為獨佔資本鋼鐵托辣斯頭子豎立丑表功，叫人去「想一想大發明家西門子及克魯伯等，想一想，那些經濟領袖，他們也由於公利的理由，由於實際的要求，也是為社會而活動的」（見史班：「經濟學說之危機」中之結語）；而另一方面，則在告訴那些出賣勞動力的人們，「先行的條件乃是機構」，離開了獨佔資本所統治的卡德爾，新特卡及托辣斯，你們便無處找到工作，無處找到飯吃。獨佔資本的經濟機構是上帝安排好的。對於這個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似的安排好了的社會組織，你們只能在這個現有的先行的機構裏，好好考慮，把自己「組織」進去。這是什麼意思呢？讀者們是一定很明白的。

七 所謂「機能」和「優能」的概念

現在，我們應該看一看史班先生的機能概念。這是全體主義在國民經濟學中的特殊表現。他說：「一個全體決不會直接由原始份子組成，而須經過間接機關，經過介全體，次等全體機關，即依照完全確定而合乎事實的序列。」又說：「經濟的實際，只是依據機構的活動——但在此種活動中有指揮和被指揮的機能，比如工程師對於旋割匠是指揮的，發明者對於工程師和建築師是指揮的，由於此種

指揮地位而產生優能的概念。」

照史班的意見，機能就是各部份在全體中所發生的作用，處在指導地位而產生的機能，則稱為優能。照史班的意見，經濟社會中的各種活動，宛如人類身體上各肢體的機能一般，都是有其作用的。所以，他舉出下列各項作為證明，即是：土地在耕種；機器在動作，工人在勞作，房屋在使用，資金在周轉，銀行在經營。在這裏，我們可暫把史班之將土地之耕種和機器之動作，作為與人類勞動無關的事情去看待的錯誤，置而不談，但是，他的利用機能概念及優能概念去肯定現代社會經濟中一些不勞而獲的人們之收入。是不能不加以檢討的。如果從社會經濟的利益來看，難道那些在交易所中的投機家，有什麼好的作用嗎？難道那些遊手好閒的依靠剪股票以為生的人，有什麼積極的作用嗎？難道那些不管水旱安坐而食的地皮所有者，有什麼好的作用嗎？如果這種作用而可以稱為機能，則機能的意義又安在呢？如果優能是產生自指揮的地位，那末，住在柏林過着豪華生活的普魯士大地主，難道他對於其治下的東普魯士農民，發生着優能的作用嗎？這都是在事實上說不通的。

假如「機能」是指社會各階層在社會的物質生產中的作用而言，則應當以其對於物質生產中的貢獻為標準。很明白，在社會的物質生產中，有些人是在出力出汗，產生剩餘價值的；有些人則不勞而獲，專在分割剩餘價值的；有的人則遊手好閒專以賭博式的手段去度其優裕生活的，在這裏，作用並不相同，不能同給以「機能」的概念，更不能以「優能」的概念，送給那些對社會經濟起着反作用的

人們。因此，史班的說話，是在事實上說不通的。

不但如此，史班以為在經濟這個全體之中，各個個體發生着機能或優點。這句話，不但一方面肯定了一些投機取巧不勞而獲的人，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而且，在另一方面又肯定了獨佔資本統治下的資本主義經濟，能夠發揮各部份的機能。歷史所告訴我們的，正正相反。當生產力發展到與一定的生產關係矛盾的時候，生產關係便成爲生產力的桎梏，它便會阻礙生產力之前進。以資本主義社會而言，經濟恐慌就是這個社會的破綻，在這裏機器房子被棄置了，一批貨物被毀壞了，麥子當成木柴燒。咖啡和牛乳被人傾在海裏，而工人呢，却找不到工作，他們的勞動力却「無用武之地」。這種情形，能夠說這個經濟機構是能發揮各部門各成員的作用嗎？顯然是不可能的。到了獨佔資本的時代，這種障礙生產力的特徵，更是發展到登峯造極了。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說：

「……資本主義式的壟斷，亦與其他任何的壟斷一樣，必然發生停滯和衰落的趨勢；隨着壟斷價格之規定（雖是暫時的），改良技術的動機，亦相當地消滅下去，因此。一切其他進步，也消滅下去；這樣便造成一種以人力方法去阻止技術進步的經濟上的可能。例如美國有個歐文斯發明了一種製瓶機，將引起製瓶業的革命。德意志製瓶業卡德爾向歐文斯買得他的專製權，而將該發明隱藏起來，不去應用。在資本主義之下，壟斷當然是不能完全和永久地除去世界市場上的競爭（這也是超帝國主義論之所以狗屁不通的原因之一），當然，因技術改良而降低生產費和提高

利潤的可能，是可以促進各種變遷的，但是壟斷所特有的停滯的與衰落的趨勢，還是繼續發展，這種趨勢在某國內，在某一工業部門中，在某一時期內，往往還要佔上風」（列寧選集中譯本第八卷一三八頁）。

由此可見史班所製造出「機能」和「優能」的概念完全是不合事實的。爲什麼他這樣起勁的說着機能和優能的概念呢？如果說穿起來，那是一件很不常的事。這就是對勞動人民打嗎啡針，說勞動人民乃是一羣不知不識的粗工，只能發生最低級的機能，沒有人去指揮便不能工作，沒有金融寡頭的獨占資本便無處可以工作。天生你們就是幹下賤工作的，當然只有在這個機構中，安份守己的幹下去。在談論機構概念的時候，已從個體對全體的關係去述說這一點；在談論機能概念的時候，又從機能與優能的關係來發揮這一點。史班先生的用心良苦矣！

無論談機構概念也好，談機能概念也好，史班先生的措詞還是隱隱約約的，如果看一看他的社會學說（一九三〇年出版）中所揭櫫的「等級秩序」，那就更可明白了。他的「等級秩序」係以「各依其等級」爲標準的。在這種社會裏面，他「建議」分成五種身份或階級：第一、創造階級是支配和重建世界的；第二、政治階級是國家領袖（包括軍隊領袖）；第三、經濟領袖他們在生產與分配方面，秉承較高階級之命，指揮下層階級；第四、熟練工人，他們包括「白領」工人與技工；第五、是執行下賤工作之一切工人。史班先生這樣的分類，就是德國法西斯專政的原本。如果用杜德（Dude）

的話來翻譯一下，則前面三種人便是：強盜貴族、軍閥、大企業家和大地主。第四種人顯然以工人貴族與工頭為主體，而最低下的則為廣大的勞動人民，面對着這一金字塔式的社會組織，身受亡國之慘痛的自由主義者捷克佛蘭芒克，不禁淒然嘆道：「這些少數人現在又成爲大眾的統治者，中古社會穿着二十世紀的外衣又出現於世。這一種新階級制度擁有戰鬥機和降落傘，擁有無線電，統制的報紙和祕密警察，其中堅份子具有「一手持劍一手持播音器的特權」（「武力經濟學」徐譯本第四十頁）。然而，這少數的特權者，在史班眼裏，將如尼采所說，是「代表着地球上的幸福，美麗和完善」的。

以史班先生所「規定」，所理想的社會組織，怎能不得出這種「機能」和「優能」的學說來呢？

八 價值·價格·市場

還應談一談史班先生的「價值」「價格」和市場的觀念。

對於價值，史班先生的見解似乎比奧國學派還不如。奧國學派是錯誤地把使用價值作爲價值的，但他們仍然表示在討論經濟學中的價值論，而史班先生則把哲學上觀念論的價值概念，直接移植到經濟領域之中來。看看他的妙論吧。「關於「對的」與「不對的」，我將作一判斷。倘若願意，諸君可以名之爲「價值判斷」或「軌道」。因爲在此全體性中，每個經濟之確定的內部的構造，都有

一個對的與不對的，完全的或不完全的經濟活動，對與不對的價值判斷，祇存在於經濟結構之內部標準中。」根據這種意思，史班之所謂價值不是別的，乃如看某一經濟活動是否為「合理的結構」，是否合於他的全體主義的標準。這完全是一種主觀的玩意，這樣的「價值判斷」，還有什麼「價值」呢？

接着，史班先生又把他的「價值判斷」發展為「價格」了。他說：「因而此種經濟或此種結構也有一個對與不對的標記，這即是價格。價格乃是經濟底關係標記，而可以有不對的關係底標記或對的關係標記，同時還可以有對的或不對的標記。」「經濟底合理結構，其正確標記即是公平價格。」

價格乃是商品底貨幣形態，離開了商品價值而談價格，那是不堪設想的。而史班先生，却正離開了這片陸地拋在海裏翻筋斗，却正企圖把價格去說明，去測量一切「經濟活動」。因此，他便陷入不能克服的困難之中了。有人反駁他的機能學說道：「發明家爲了麵包而將他的發明出賣，而企業家則因此致富，則優能何在呢？」他回答道：「所謂優能，即在機能底機構中，顯然發明家永遠處於指導地位，如果諸君乘船過斯皮萊河，或過一海，這船用了螺釘，而諸君因萊什（Lash）發明船底螺釘底機能才能架船。萊什於此有利實關係，也是這船第一個指導者，他有優能，無論他死去已久，也無論他爲窮鬼而死，別人則已變成富裕。此種優能和內在的指導性質，是完全不變的。如果價格不能對優能加以標明，則價格將是機構底不正確的標記」。這是一段莫明其妙的妙語。在這裏，我

們應注意的不是萊什的在天之靈，對一切架船的人發生優能，發生指導性質的鬼話，而是他的「如果價格不能對優能加以標明，則價格將是機構底不正確的標記。」一面以價格為經濟關係的標記，而另一面又承認價格是機構底不正確的標記，這不是他陷在不能克服的矛盾之中嗎？價格是量的決定，然而他却宣稱「它（指價格）的高度不能機械地決定，」這又不是他的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嗎？

如果從本質上來說，史班之所謂「公平價格」，不外是獨佔價格之神祕化而已。因為它是「經濟底合理機構」的「標記」，而在史班的心目中，托辣斯等獨佔組織，是合理底經濟機構。反之，那些在獨佔資本以外的不合理的機構，是沒有公平價格的。因此，必須將這些不合理的機構，完全去掉。這不是獨佔資本吞併中小資本的理論根據麼？其實，正相反，在壟斷組織形成以後，爲了打倒對手，新德卡或托辣斯等組織可能降低價格，但到了打倒了競爭對手之後，便長期提高價格了。這些獨佔資本便長期的從人民手中，取得超額利潤，難道這是「公平的價格」嗎？史班先生，「可以休矣！」

談到價格，當不能不提到市場，史班認爲「市場是表示組織底關係。」我們在上面論到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時，已經看出資本主義經濟底什麼組織性完全是虛妄的了。在個別的工廠中，「生產」誠有組織（這或許是史班所稱的有組織性吧）至於各單位之間——即市場關係，那是亂七八糟的。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組織與全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是對立的，更進一步，前者又加強了後者的

嚴重性。到了獨佔資本的時代，這種紛亂更加利害了，列寧說：自由競爭生長起來的壟斷，並沒有消滅競爭，却是在自由競爭的基礎上存在，與自由競爭相並立，由此而產生出許多特別緊張，特別嚴重的矛盾和衝突。『這一切，駁斥了史班的全體性的胡說，但在這裏，我們還應指出：史班爲什麼這樣重視市場或交換關係呢？因爲在市場中，資本家之間的商品流通是站在平等的地位的，而勞動力的購買，亦是站在價值法則的場合之上的。馬克思說得好，『勞動力的買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內進行的，這個領域是天賦人權之真正的樂園，在那裏行使支配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Beitham）』（資本論第一卷中譯本一二五頁）。史班之強調交換領域，就是叫人不去注視生產過程，就是用這種辦法去掩蓋醜露的黑暗的獲取剩餘價值的祕密。

九 全體主義是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同敵人

一如史班先生在德意志經濟學者國家協會上，批評近代經濟學說各派之內容一樣，我們之批評全體主義，亦只講到『它的方法以及根本的，構成這體系的學說思想。』所以，到了這裏，我們的話亦就應該打住了。

史班的全體主義的經濟思想，是在墨索里尼上台以後希特勒當權以前提出來的。他是意大利的法西斯的應聲虫，在經濟思想的領域中，爲墨沙里尼找地盤；同時，他又是德國國社黨的傳聲筒，在

經濟思想的領域中，爲希特拉開闢道路的。依照他的見解，社會經濟是一個有機體，而且應該只能成爲有機體。這個有機體的本質，就是一個社會牢獄，就是一個戰爭機構。他之所謂「文化生活是更高的全體」，只是一句騙人的鬼話。但若以墨索里尼之稱吞併阿比西尼亞爲「宣揚文化」希特勒之稱其在歐洲大陸及蘇聯西部之殺人放火爲表彰德意志文明，則史班之所謂「文化」，倒也有他的「解釋」。

史班的全體主義是新黑格爾主義的一個支流。這一股逆流，是以反對自由主義及社會主義爲自己的課題而出現的。根據新黑格爾主義來說，自由主義之所以必須反對，是因爲它的原理是社會原子論，而這個社會原子論又爲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的社會主義的原理，所以他們便提出全體或國家來了。史班的全體主義就是新黑格爾主義在社會學經濟學方面的有力的台柱。史班先生本人，就是以反對古典學派和馬克斯主義的瘋狂的戰士的姿態出現在德奧的思想界的舞台之上的。但，說一句透澈話，他之所以反對自由主義，是因爲古典學派中包含了許多科學的成份，而這些成份又爲馬克思所承認所發揚，故火力之集中，表面上雖對準自由主義，而實質上乃在社會主義。所以他拚命的說馬克思「在科學上是死去了。」可惜，事情並不如史班先生的所願，馬克思不但未嘗在科學上死去，而且經過列寧與斯太林的發揚光大，正如旭日東昇，前途無量。反之，反對馬列主義最兇的法西斯主義，却正正在其殺人放火的火焰中燃燒成爲灰燼。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已進入墳墓，讓我們亦在大地上，在

中國域內，根絕這一個爲法西斯匪徒在經濟思想領域中張目的全體主義吧！

一九四四·一，一九於重慶紅岩村

後記

這裏五篇論文，是抗戰期間在重慶寫成的。戰時經濟許多急切的問題，迫得我們非去分析，非去謀取解決不可，在這種情形之下，理論的檢討，似乎是可以放在次要的地位的，不過，實際是不能脫離理論的，在討論某一個實際問題的時候，自然而然的就會牽涉到理論上去。我之所以批評購買力平價說，就是在抗戰初期由於討論外匯政策的需要而來的，這是一個例。至於批評「社會價值論」，「人性論」及「全體主義」諸篇，在表面上看來，似乎與實際問題無關，但仔細看下去，這些「學說」，都是某些人作為「措理」經濟問題的根據。實際性是很濃厚的；「戰鬪性」亦是很濃厚的。

中國畢竟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從打外戰到打內戰的軍伙，從日用所消耗的糧食到投機市場上所追求的黃金，無一件不是依靠友邦的供給。在思想界方面呢？亦依然不脫離「進口貿易」。七十三年前馬克斯在寫資本論第二版跋時嘗諷刺德國資產階級的經濟學的幼稚。他說：「直到現在，經濟學在德意志，還是一種外來的科學。……這種科學，依然是當作完成品，從英法二國輸進來。德國的經濟學教授，都還是學生，外國的現實之理論的表現，在他們手上，成了若干教義的集成。……一八四八年以來，資本主義生產在德意志迅速發展了，現今還正好在迷人的開花時期，但我們的專門家，時

尚還是不佳，當他們能够公平研究經濟學時，近代的經濟關係在德意志還缺少實現性，而這種關係生出之後，在資產者視野之內，又不許再有公平的研究了。」今日的中國，較諸當時的德國還差得很遠。在資產者視野之內，經濟學早已不許有公平的研究，而中國的現代的生產關係呢？却在過着「春行冬令」的厄運，因此，中國的資產者經濟界更是幼稚得可憐。他們的最大的本事，只能把自己當作留聲機，照樣地把外國教義複述一道而已。至於他們所複述的東西，當然不是帶科學性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而是那些代表寄生的獨占資本的最反動的「法西斯思想」。這種情形，不是明明白白地把這些大人先生們的買辦性表露出來了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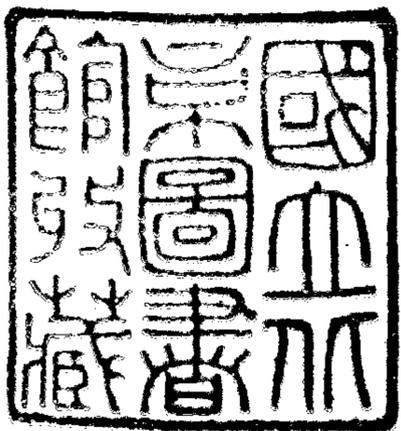
說中國布爾喬亞的經濟學家一點沒有「創造」，恐怕是不「公平」的，我們應該承認這些大人先生們的勞作。不過，他們的勞作乃是在於把中國的封建思想——以儒家學說為代表，來與他們從歐美運輸進口的教義，結合起來而已。這是一件很必然的事情。中國的買辦階級從外國輸入洋油或藥品等等，都是入口後在中國境內改裝的。這件本事，被人們從倉庫或包裝廠，移到研究室來了。特別近年人們在提倡中國經濟學說的時候，一些領津貼的辯護者都在幹這一套把戲。但是，不管人們怎樣費盡心機使用中國的仁義道德，去粉飾其從外國販運進來的法西斯思想，到底是沒有什麼好結果的。因為這種幹法，不但暴露他們的買辦性而且暴露他們的封建性。

這裏所批評的對象——「社會價值論」——「購買力平價說」——「人性論」和「全體主義」都從歐美販進

來的商品而烹調着中國醬油的。社會價值論者從歐美借用一些極其庸俗的見解，再加上中國民粹派一些背離科學的見解，企圖藉此以推翻勞動價值說；人性論者從衛勃倫抄下一個提綱，而把儒家思想裝進這個提綱；全體主義雖然是德國法西斯蒂經濟學家史班所倡導的，但所謂「中國經濟學說」(?)却把它作為這一個「學說」(?)的基本思想。德國的商品既然運入中國，又再加上了中國包裝，當然是非同小可的。購買力平價說的影響雖然比較小，但因這一學說被人拿來解釋中國貨幣金融，所以亦非提出來檢討一下不可。

作者對於經濟思想是沒有什麼研究的，不過，讀了大人先生們的這些著作之後，總覺得「鬱悶在胸」，「不吐不快」。所以敢於不揣淺陋，陸續寫出這些短文，表示自己的看法，在這裏，幼稚是免不了的；錯誤亦是免不了的。但若因此而在這個風平浪靜的中國經濟學界裏，能够吹起一陣波瀾，來蕩滌一些反動的，俗流的見解，那就是作者極大的欣慰了。謹在這裏，準備接受高明的批評，並向那些御用的經濟學者挑戰！

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夜於上海虹口公園邊



經 濟 論 衡

著 者	許 滌 新
發 行 人	黃 新
發 行 所	耕 耘 出 版 社 上 海 華 龍 路 八 十 號
基 價 伍	圓
版 次	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三 版

· 有 所 權 版 ·

.186
-7.



R \$ 5.00 ✓